

第四章 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基礎的民族主義

中共從起源來看，可說是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物。他們是以民族主義為起點，走上馬列主義的道路；也由於他們信奉了馬列主義，所以他們的民族主義中便帶有國際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因素，從而有別於一般所謂的民族主義。這就是說，「中共雖然是民族主義者，但不是一般所謂國家至上的國家主義者；他們雖然宣稱自己是愛國主義者，卻同時強調自己也是認同世界共產革命的國際主義者¹，並不以追求中華民族的自我『解放』為滿足，同時也以追求全世界工人無產階級的『解放』為鵠的」（陳永發，1998：964-965）。因此我們認為，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內涵，主要包括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毛澤東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乃是以階級民族主義為主軸，而鄧小平時期以及鄧後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則是偏重於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本章著重探討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即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就其意義、性質、任務和內容分別敘述，並從後殖民主義的角度加以反思與評析。

第一節 以階級民族主義為主軸的愛國主義教育

從歷史角度看，學者認為有必要將階級看成是一種民族觀，即把它建構成一種特別而強有力的民族的修辭用語。在中國，李大釗即以階級的語言來想像在國際舞台上的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是一個被西方資產階級所壓迫的無產階級民族，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一部份」；當然，這並不是中國特有的情況。拉魯依（abdullah Laroui）則把處於這一階段的民族主義稱為「階級民族主義」（class nationalism），不過這種階級民族主義，其中仍保留了政治和文化的民族主義的若干動機，是故，學者往往感到很難對它

¹ 中共相信，蘇聯的十月革命已充分證明，未來的世界是社會主義的，一場反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正在展開之中，正因為中國革命要在這一場世界革命中展開，所以比俄國要落後許多的中國，可以透過以俄為師，直接從事共產革命，一方面追求民族的自我解放，洗雪鴉片戰爭的國恥，另一方面則切斷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源供應，使先進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在喪失「賄賂」其國內工人階級的力量以後，不得不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歷程。從這個觀點看來，中共只作為世界革命的一環，而蘇聯才是世界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中心；中共尊奉蘇聯為社會主義的祖國，當然不會妨礙中共對愛國主義的認同。請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964。

做出定義。這裡，民族觀念便具有超國界訴求的革命語言與民族確定性間的張力之所在。以階級鬥爭的革命語言界定民族的另一種手法，乃是把階級鬥爭的「普遍」理論置入民族的語境中²。一九三〇年代，「毛澤東上升為與列寧和史達林齊名的最高理論家的地位，以及『中國模式』革命運動的誕生，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Prasenjit Duara 著，王憲明譯，2003：11)；這時候，民族特性便體現在由中共領導的獨特的階級鬥爭模式中³。因此，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是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這樣的教育我們便可稱為「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壹 階級民族主義

誠如上述，「階級民族主義」的概念，乃由拉魯依所提出，他認為這個概念是指「在階級鬥爭日益國際化的場景中，一種經常為第三世界革命份子所喜好採行的，與歐洲對抗的民族主義形式」。而在當代中國的歷史上，「這種階級民族主義，又可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中國民族被視為是一個為世界資產階級所壓迫的階級；到了第二階段，則進一步在自己民族共同體中去區分革命和反革命階級，試圖將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等同起來」(羅曉南，1997：199)。這兩個發展階段，又可分別以李大釗和毛澤東來代表。李大釗的階級民族主義，其重點有三：其一，他反對「全盤西化」和俄國化的救國主張，相信兩千年的思想文化傳統，是有其價值的；他雖然選擇了「來自西方又反西方」的馬列主義道路，可以減緩被「他者化」的困境，但卻始終堅持馬

² 最懂得將馬克思主義透過反殖民主義而與民族主義結合起來以推進世界革命者是列寧(N. Lenin)。列寧認為「共產國際對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全部政策，主要應該是使一切民族和各國無產者和勞動群眾接近起來，以便進行為推動推翻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共同革命鬥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對資本主義的勝利，而沒有對資本主義的勝利，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底消滅就不可能」。可見第三國際的列寧在推展世界革命的努力上，基本戰術是一方面團結各國先進工作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另一方面也團結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運動。這等於說，只有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才能保衛蘇聯和完成世界革命。以上請參見姜新立，「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載於洪泉湖、謝政諭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91年），頁42。

³ 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在會見斯諾(Edgar Snow)時就如此明確地談到了他理解的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於一個被剝奪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務不是立刻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爭取獨立。如果我們被剝奪了一個實踐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就無從談起。」毛澤東在這裡講得很清楚，即一個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是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基本前提。而在另一位著名共產黨人李維漢的筆下，「資本主義社會，是現代民族形成並獲得發展的時代；社會主義社會是民族全面充分發展的時代；共產主義社會是民族逐漸消亡的時代」。以上請參閱：Edgar Snow 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頁374-375；李維漢，關於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若干問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頁91。

克思主義中國化。其二，他提出東方文明應與西方文明相互融合，才能創造出不斷進步的新的第三種文明。今日由於東方文明遲滯了，西方文明又囿於物質生活的氾濫，因此唯有新的第三種文明出現，最後方能克服這種世界性的危機。而中國則需要一次精神的再生，此將在中國的舊文明和當前新文明之中被表現出來。這種看法相當地反映了一種民族主義的傾向。其三，他不排斥世界主義，認為俄國革命比法國革命更進步，因為國際主義更突顯。他雖然強調在民族共同體內的互助合作，但也未放棄他對馬克思階級鬥爭觀的接受，而是將後者用於民族之間的鬥爭。換言之，他將中國的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反帝鬥爭相結合，但這種階級鬥爭並沒有妨礙到民族統一獨立的目標（羅曉南，1997：199-201）。沒

費茲傑羅（John Fitzgerald）對李大釗的意圖了解最為清楚：李把當代的階級鬥爭定位在國際關係的領域。階級分析是以民族為單位，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將其貼上國際「無產階級」的標籤，而壓迫他人的民族則被看成是超國家的「資產階級」。在此，中國的世界身分建構便自然是一個獨特的階級民族。李完全明白當他對唯物史觀作出順應現實的表述時，便會忽視了對中國本身革命中階級鬥爭的展望。事實上，這一點正是關鍵之所在，它將有助於維持現代統一民族的理想或儒家傳統的社會和諧的理想（羅曉南，1997：201-202）。然而，到最後，這種「統一民族」和「社會和諧」的理想已經無法在第二階段毛澤東的民族主義概念中繼續維持。不過，羅曉南認為，李大釗的階級民族主義仍在三方面影響了毛澤東的觀點：（一）中國雖落後，但到社會主義之路反較更便捷。（二）農民主義傾向。李的民族主義取向，使他一再強調農村對中國民族振興的重要性。在一九一九年，李呼籲青年到農村去，與農民一起工作；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間，他又對革命知識分子之疏離農民群眾表示關切，特別提及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核心角色⁴。（三）重視階級意識、精神修養。李重視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一個關鍵的因素是通過「階級意識」的概念，來凸顯人的活動和人在歷史中的角色，質言之，即人的意志和其他精神要素。總的來看，「李大釗還只是表現為想像的『階級民族』，而到毛澤東手上，經過理論的修補和策略的運用，將之具體化，成為現實中

⁴李大釗的農民主義日後被毛澤東發揚光大。毛不只將「人民民主專政」中「人民」的定義加以擴延；使得農民可以被涵蓋進來，而且認為農民還會成為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階段中的主要力量。這與列寧的主張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農民的反動保守傾向的判斷完全相違，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主義更是背道而馳。以上請參見羅曉南，當代中國文化轉型與認同（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204。

『反帝』、『反資』、『反封』以維繫『階級民族』之利益的工具」(羅曉南,1997:202-207)。這裡,我們將進一步探討毛澤東時期的階級民族主義,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窮過渡」和唯意志論: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發表〈論十大關係〉中,他提出著名的「窮過渡」理論,強調從發展的觀點看,一窮二白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毛澤東,1977a:287-288)。毛不同意列寧的「國家愈落後,它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愈困難」的論斷,他反而認為,「經濟越落後,從資本主義⁵過渡到社會主義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難,人越窮,越要革命」(毛澤東,1974:333-334)。在他看來,一窮二白的中國具有革命的特殊優勢,前工業化的中國正在開闢一條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未來的道路。毛的「窮過渡」理論和俄國民粹主義有極為相似之處。俄國民粹主義者稱讚落後的優點,認為落後反有潛在的革命優勢,沒有傳統包袱,可避免西方由於「過度成熟」所導致的道德墮落。同樣地,毛也視「落後不是壞事」,「一張白紙,正好寫字」,「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人越窮,越要革命」,由於落後,中國反而較易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塑造「社會主義新人」(關向光,民85:303)。再者,毛這種「窮過渡」又與他的唯意志論有密切的聯繫。雖然他一直宣稱自己是一個唯物論者,但是他終身活動的基本信念:只要給民眾適當的激勵,就幾乎可以克服一切的物質障礙,達到最後的目標。因此,毛相信只要能在農民、知識分子以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群眾中進行「思想改造」或「思想學習」,令他們產生「社會主義覺悟」,便能突破歷史發展的規律(楊君實,1987:98)。大躍進的策略之一,就是以大規模政治動員,鼓動人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以令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過渡可走得比蘇聯更快。換言之,毛的「窮過渡」則是以片面誇大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為前提,這與大躍進的思想一致。因為,在窮的條件下講過渡,當然要以精神力量來彌補物質力量的不足。總之,毛透過「階級民族」的想像不但民

⁵中共自一九四九年成立政權之後,毛澤東對於資本主義的看法有過多次的反覆。一九五〇年毛反對過早消滅資本主義,重視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一九五五年毛提出要使資本主義絕種;一九五六年毛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再搞資本主義;但緊接著又要消滅資本主義殘餘,包括一九五七年反右擴大化,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隨後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綜言之,對於資本主義,毛先是肯定其在歷史發展階段中的一些作用,後來則主張消滅資本主義,直至所有制的資本主義已不存在時,仍要消滅上層建築中的資本主義殘餘。請參見關向光,論中共大躍進時期的「毛澤東路線」(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85年),頁300。

族民主革命可以和社會主義革命聯結起來⁶，而且也有助於建立一種儘可能包含整個民族在內的中國式社會主義。

第二，群眾路線與民粹主義：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的另一特色，即他在延安時期發展出一種稱為「群眾路線」的領導方式理論，其中黨要扮演打頭陣的角色，而民眾則要熱烈參與。其基本的理念是，直接和群眾接觸的幹部，要保持與民眾的密切關係，以了解民眾真正的需要與關懷。之後這些幹部必須就他們的了解向上級報告，以讓領導能充分把握民眾要的是什麼，不要的是什麼。最後，最高領導以他們對歷史法則與國家全盤狀況較高層次的了解，才能夠做出適當的決策，讓革命在一種強而有力但也能為群眾接受的務實方式下向前邁進。當因此而做出的新的行動命令下來時，地方幹部就要設法讓民眾一起來加以實現，以便得到群策群力的效果。毛自己用一句話總括以上整個的過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72-376）。毛的這種群眾路線與運動，不但可以避免共產黨領導腐化的問題，同時也可以降低正式官僚體制對他追求更激進目標的阻力。然而，在毛對延安時期發展出來的群眾路線與運動的手法肆意濫用之下，一九四九年後舉凡「土改」、「鎮反」、「五反」、「肅反」、「反右」、「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等都對中共國家機制的步調、風格、與實質作業造成嚴重的衝擊。其次，毛的階級民族主義的又一突出表現，即帶有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這使他認為真正的革命創造力源泉是在農村。一九五八年與一九二七年⁷相似，「人民」主要是指廣大農民，毛再次把農村作為進步和新生的源泉。實現人的道德和思想轉變的主體是「先進的農民」，不是城市居民。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任務，不再是城市無產階級的專任，而是由農村人民公社承擔。此外，毛也不信任知識分子，他對群眾的自發性依然持民粹主義的信念，相信在群眾自己的革命

⁶毛澤東為了解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使得資本主義還未發達的中國，可以有直接向前發展社會主義的可能，其主要關鍵就在於他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中，毛修正了馬克思原來的歷史發展階段有關理論，以無產階級取代資產階級進行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這裡，毛只是更動了革命的領導權，並沒有更動歷史發展的階段。其次，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中，雖然歷史發展階段的名目不同，但仍然是以新民主主義階段代替資本主義階段，要經過新民主主義這個歷史階段，完成原應由資本主義歷史階段所完成的發展生產力的任務，從而在此基礎上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再次，後來新民主主義論被拋棄、被過渡時期總路線所取代，毛仍沒有放棄工業化的信念，而是要將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進行。以上請參見關向光，論中共大躍進時期的「毛澤東路線」（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85年），頁299。

⁷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在其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他發現中國農民身上蘊藏著巨大的革命力量，他預言說，這股力量能夠橫掃它面前的一切障礙，包括那些不願意與農民打成一片的革命知識分子。後來，毛還表達了他對城市知識分子的「知識」的不信任和對農民固有「智慧」的欽佩。以上可參考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12-44。

實踐中會產生有文化的人，進而實現他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民族理想。列寧提倡把城市的無產階級分子派到農村去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毛卻提倡把城市居民送到農村去向農民學習「無產階級的優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規模地把城市居民送到了農村（Maurice Meisner 著，杜蒲譯，2005：41-46）。總括而言，毛澤東思想的許多特徵都具有典型的民粹主義思想：對職業專門化的蔑視、對知識分子和專家的極度不信任、對官僚主義的深惡痛絕、反城市的偏見、革命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浪漫氣質等等。

第三，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早在一九三八年，毛澤東就寫道：「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毛澤東，1966b：520-521）。在毛澤東看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幾乎是同一回事。在中國從事的民族主義革命，是對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大貢獻，是國際主義的實際體現。不過，儘管蘇聯對中國共產黨尋求國家獨立的民族革命鬥爭給予了支持，但蘇聯領導人明確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繼續奉行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共領導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便再也不可能把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等同起來。他們必須將民族主義的政策議程和國際主義的義務協調一致。由於蘇聯認為國際主義意味著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應無條件地服從蘇聯政策，兩者的協調註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早期，當中國面對此種困境時，國際主義顯然占了上風，比如一九五〇年中共加入了韓戰即是明證。五〇年代中後期，中蘇矛盾逐漸顯露出來。在如何建立一個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如何正確處理與資本主義世界關係問題上，中共和蘇聯的分歧日益加深。赫魯雪夫開始談論與美國和平共處的可能性，而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則針鋒相對地喊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豪言壯語，號召社會主義陣營向資本主義陣營發動攻勢（毛澤東，1977b：291）。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之後，毛澤東雖然拒絕了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但沒有導致他拒絕本質上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反，毛提出了一個替代性的中國式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構想，它比蘇聯式的更為激進，更具革命性和進攻性，並且同毛眼中的中國民族利益相吻合。一九六三年

六月，中共提出了「現階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⁸，它要求：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人民日報，1963：6，7）

新的中國版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路線將「世界革命」作為它「在現階段」的工作，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反動派作為它要打倒的目標，並支持全球的所有革命力量。這不僅與蘇聯較為溫和的政策（被貼以「修正主義」的標籤）發生決裂，而且比以前較為狹窄的只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目標更為激進。毫無疑問，「世界革命」版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包含著濃厚的意識型態成分。不過，我們仍然可以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具有革命色彩的毛式階級民族主義的國際表達。

第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其核心就是「使馬克思主義適合於中國的國情即中國的實際，並使之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楊奎松，1994：1）。一九三八年底，毛澤東在正式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後，開始賦予全黨「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任務，即「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因而「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特點，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1966b：499-500）。這裡，毛澤東完成了以民族主義的內涵去填補由蘇聯國際主義觀點出發下的馬列主義在中國革命實踐上的不足。也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只有先將馬列主義徹底地中國化、民族化，才有可能結合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而要想真正實現馬列主義的中國化與民族化，就必須深入瞭解中國社會現實，亦即必須先立足於中國實際革命場域。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民族與國家的概念引進馬克思主義中，或是說，把階級（馬克思主義）的

⁸ 這是中共給蘇共一封回覆的信件，題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覆信》，此揭開了中蘇意識型態大論戰序幕。之後一年左右時間中共中央發表了九篇文章，這就是被稱為反修防修綱領的「九評」，影響極大。以上可參閱：人民日報，1963年6月7日。

概念引進民族主義裏。如此，由政治界定民族之後，階級進入民族主義的論述，成為公民、種族之外的另一選項，中共使用階級的概念，就像自由主義者使用公民、民族主義者使用種族一樣。階級在中國大陸成為區分敵友⁹、區分革命與反革命、區分是否為愛國主義者，最後，區分是否為中國人的標準。總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意義集中在「毛澤東把民族、國家與階級結合起來，形成一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學說，這套把民族、國家與階級結合起來的學說，雖然在中共民族主義革命的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兩個目的上，獲得初步的成功」（董立文，民 86：38）；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這套學說雖同樣為中共政權的鞏固服務，但如此一來卻與民族主義的原來目的之一日漸產生衝突，亦即與現代化的目標產生衝突。反之，卻為「不斷革命論」階級鬥爭觀點的持續，提供了思想淵源與理論基礎，最後終於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大陸剛剛起步的現代化整整又延遲了十個年頭。

繼華國鋒而後的鄧小平與鄧後時期，在基本理論上，除經濟領域力求現代化外，一切仍本之於鄧小平所提出的「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與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在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即含有在階級民族主義的認知上，仍要有所堅持。這就是說，鄧小平在經過取得中共黨內意識型態歷史解釋與政治權力支配的主導權之後，已非常注意來自黨外的社會大眾或知識分子的抗議與挑戰。他通過不斷強調文革的動亂，宣示絕對不允許他們對中共領導權威的挑戰，亦即強調文革動亂是為防止、壓制來自黨外人士的挑戰尋求其合法性的辯護基礎。當鄧小平在突顯文革動亂時，他一方面揚棄階級鬥爭，如此文革動亂中的派系或團體衝突，與毛澤東對異己的整肅，都在階級鬥爭的強調下獲得意識型態的辯護；不過，他並未完全拋棄階級鬥爭，而是選擇性的保留運用階級鬥爭，尤其是在對付政治異己時，階級敵人的訴求就會重新湧現。另一方面，鄧小平也揚棄群眾路線和運動，

⁹ 羅曉南認為，當階級鬥爭及其相關的「區分敵友」和「衝突合法化」的概念，被運用於民族共同體內部時，問題就發生了。在「區分敵友」方面，表現為：封建的、剝削的傳統文化和革命、反封建的新文化，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反動的新文化和革命的、反帝的、民族的新文化，反動的漢奸、地主、買辦和革命的工農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紅五類和黑五類，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紅和專，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革命造反派和黨內走資派……等。經由種種思想改造、清除階級異己以及文化革命等「反封」、「反資」、「反修」的群眾運動，激發並強化了近代以來中國民族本已澎湃的民族主義情緒。此外，這種由階級民族主義所激起並昂揚的排外反外的強度，就在這種同時破壞傳統中國的「社會和諧」及近代「統一民族」這兩種理想的過程中，被巧妙的轉化了，並且得到了宣洩，換言之，亦即階級革命的普遍原則綜合了民族主義的特殊原則，排外、反帝不僅可以在「國際主義」、「世界革命」的旗幟下被包裝、掩飾，而且也確實經由此「內部分化」、「外部敵人內在化」的過程，轉移了攻擊鬥爭的焦點。以上請參見羅曉南，當代中國文化轉型與認同（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207-209。

但對於群眾路線與運動也是選擇性的加以保留運用，特別是在鄧小平和中共認為，已經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對付那些會挑戰中共意識型態權威的社會思潮時，群眾路線和運動就會重新躍上檯面，而社會思潮則包括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等（Dittmer，1994：28）。所以，階級民族主義作為中共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成分，到了鄧小平和鄧後時期，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被保留下來。

貳 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毛澤東時期，中共政府首次於一九五一年在全中國大陸宣揚愛國主義。同年元旦，《人民日報》刊載「在偉大愛國主義旗幟下鞏固我們的偉大祖國」社論，明白指出「愛國主義」內容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保衛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果實」、「擁護新民主主義」、「擁護勞動人民」、「擁護中國與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以及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國際主義聯盟」、「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進行這種教育，對於完成中國人民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光榮任務，將是一個經常起作用的動力」（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編，1951：3）。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共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目標，標榜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鼓吹領袖崇拜；崇尚共黨專政意識，對其他政治意識型態如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則表示敵意，突出馬列主義史觀（唯物史觀）來劃分和闡釋歷史階段和階級鬥爭推動歷史發展的作用；並積極鼓吹愛國主義或民族感情，強調人的意識作用和民粹主義路線，推展群眾運動和國際主義運動等。即使是在後文革時期，中共已從毛澤東理想主義革命路線轉變為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漸進改革路線，但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意識型態的教育目標，並針對和平演變和抵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衝擊，再度強調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思想。茲敘述如下：

一、堅持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意識型態教育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代表中共官方的意識型態；明確地說，中共的政治意識型態係指「共產主義」，其思想源自西方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後經列寧、史達林的「蘇聯經驗」，而後再由毛澤東加以「中國化」詮釋。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之後，歷屆領導人無不強調黨的領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同時，他們也聲稱在

各個歷史時期的教育路線、方針、政策，皆要依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觀點¹⁰來制訂的。一方面，在大學普遍開設了三門必修的馬列主義理論課，即新民主主義論（一九五三年起即改為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王瑞琦，民 78：55）；另一方面，中小學應實施以「五愛」教育¹¹為主的共產主義德育：一九五二年三月，中共教育部頒發試行的《中學暫行規程（草案）》規定，中學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和普通文化知識教育青年一代，使他們的身心獲得全面的發展，以便為升入高等學校或參加建設工作打好基礎」；中學應「對學生實施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等全面發展的教育」，使學生「養成科學的世界觀」，「發展學生為祖國效忠、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養成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的國民公德和剛毅勇敢、自覺遵守紀律的優良品質」。與此同時，中共教育部頒發的《小學暫行規程（草案）》規定，「小學教育的宗旨是：根據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和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給兒童以全面的基礎教育，使他們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熱愛祖國和人民的、自覺的、積極的成員」，「小學實施智育、德育、體育、美育全面發展的教育」。小學道德教育的主要目標是「使學生具有愛國思想、國民公德和誠實、勇敢、團結、互助、遵守紀律優良品質」（張萍，吳魯平等主編，2001：256）。在其後的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活動中，馬列主義理論課和「五愛」教育一直是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內容。

¹⁰ 中共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嚴密而完整的科學思想體系，中小學階段只能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觀點教育，而不能過分強調系統與完整性。就其基本原理觀點而言，中共根據列寧的分析，從三方面進行概括：即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是關於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發展最普遍規律的科學，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應用於研究社會和歷史，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哲學不僅說明怎樣認識世界，更主要的是說明怎樣改造世界。因此它是人類、特別是無產階級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社會經濟生活，主要是生產關係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並以之演繹引申，說明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依據。科學社會主義，是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發展過程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所得出的科學結論；它向無產階級指明了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條件和道路，說明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它是直接指導無產階級行動的理論。由此可看出中共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統性與邏輯性。以上請參見吳鋒主編，思想政治教育學（杭州：杭州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 39。

¹¹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共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共同綱領》所提倡的「愛祖國」教育是「五愛」教育的核心，也是中共建立政權初期時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點。以上請參閱浦衛忠等著，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 64。

不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批評了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和取消政治課的錯誤¹²。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麼政治、什麼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因此他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並且說，學生「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毛澤東，1977a：388）。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要求在所有學校中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養學生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集體觀點、勞動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至此，中國大陸教育的基本方針被確立為：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張萍，吳魯平等，2001：257）。毛澤東提出的新教育方針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大陸今後很長一個時期的教育方向，它將思想政治教育置於重要地位，明確了「有社會主義覺悟」與「有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與知識傳授的關係。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中國大陸各級各類學校的「政治」意識逐漸強化起來。從一九六〇年代以後，毛澤東的著作也成為大學政治理論課的必修內容。中小學則以學習《毛主席語錄》¹³以及毛澤東的一些簡短的文章為主。「文革」期間，一九五〇年以來逐步建立的教育思想和內容統統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或修正主義的產物受到徹底批判，學生成為批判者、教育者，而教師則成為被批判、接受再教育的對象，大、中、小學的教

¹² 其原因係受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的影響。在「鳴放運動」中，教師和知識分子曾對共產黨發動總攻擊，要求黨退出學校，要求教授治校；而在學生方面，也發生「新五四運動」，這對毛澤東是個很大的刺激。因此，自一九五七年起，大學政治課又有增強的趨勢。中共第三次教育行政會議決定，在各校普遍開設社會主義教育課，以配合「鳴放」以後的反右運動。最足以反映「毛澤東思想」的，還是在課程教授方面，規定要聘請幹部、模範工作者、勞動英雄、「土」專家擔任，這是學校教育中打破傳統的決定。以上請參閱王章陵，中共教育制度（台北：正中書局，民66年），頁201。

¹³ 一九六〇年，林彪開始了一場把人民解放軍變成「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運動，隨後，林彪著手用這所學校教育全國人民——把教育過程變成神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過程。正是軍隊的總政治部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版了第一版《毛主席語錄》。這本語錄不久便以「小紅書」著稱，人們對它頂禮膜拜，林彪為「小紅書」的再版寫了前言，他不遺餘力地誇大毛澤東思想的普遍效力和巨大威力，宣稱「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天才地、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人民群眾、幹部和知識分子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以上請參閱Maurice Meisner 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年），頁259。

學全部陷於癱瘓狀態。取而代之的是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各校均以「毛澤東著作」為基本教材，以「階級鬥爭」為主課，學生和老師要花三分之二的時間向工農兵學習「三大革命」：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姚若冰，1984：109）；有的學校，由於原有教材大都遭到否定和廢棄，「毛澤東著作」幾乎代替一切。

到了後文革時期，鄧小平並沒有完全放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型態教育，他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即為明證。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掌握大權後，中共的基本路線可以說是鄧小平的路線；而鄧小平的路線用一句話來說是「政左經右」的路線，也是一方面改革開放，一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堅持」是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首次提出的，他說：「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3）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提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八二年，中共把「四個堅持」寫入憲法。如今，這幾個「堅持」已成為中共的黨紀國法，因此對學校青年和知識分子進行所謂「平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都是在「四個堅持」的旗號下展開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鄧小平曾說：「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而他所說的教育，「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北京工業大學教授沈參璜指出：學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主要表現在只講開放、改革，而「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卻講得不夠，也很不落實，一些學生對為什麼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認識「很模糊」，甚至「很錯誤」。學校黨團組織的作用不能發揮，生活不太正常，黨的監督保證作用也不明顯。一些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的身教、言教等，也做得很不夠（黃寬裕，民82：182）。顯然，中國大陸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欠缺，而師生都對思想教育不重視，因而「六四」之後，中共覺得需要深入進行「四項基本原則」教育的強化。此外，隨著東歐、蘇聯共黨政權相繼倒台，更迫使中共將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視為中國大陸學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最迫切的任務」。而為防止所謂國際敵對勢力利用思想滲透的「攻心策略」進行「和平演變」，中共中央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作為今後長期對青年學生和幹部群眾進行思想理論教育的基本教材（許啟賢，1999：361-369）；並發起重新學習「毛澤東選集」熱，強調毛澤東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即已提出注意反對「和平演變」的思想。

二、強調階級鬥爭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

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理論。而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是最能突出毛澤東階級鬥爭思想的課題，毛澤東認為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他也以動員農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因此，過去歷史教科書敘述很多朝代的農民起義，其中也有為中共威權合法化的重要意義(陳其，2001:338-339)。一九四九年後，中共重新燃起土地革命，當時土地革命的對象僅限於地主。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基本上又消滅了富農和富裕中農。與此同時，城市和工廠中的階級鬥爭對象應該是資本家和理論上是附屬於資本家的知識分子。為了鞏固政權，中共發動了一系列清算右派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既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敵人，那麼在階級鬥爭中，資本家便是受政治整肅的對象。那些和帝國主義或國外資本家曾經有過聯繫的人，也被視作國內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在每一場階級鬥爭運動中，這些國內的資本家、反動派便成為被清算的對象。不過中共在建立政權初期，迫於經濟困難，不得不採取勞資兩利的政策，但暗中已經為將來消滅他們進行部署。其作法是：「在勞資兩利的口號下建立新工會，實際則是把工會建立成一個階級組織，以便有朝一日透過和平贖買或其他的政策，來消滅所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至於知識分子，在中共眼中他們原本就不是一個階級，「與其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依附物，不如說他們早已淪為中共政權所『包下來』的個別分子」。然而，在一九五七年這些知識的菁英「錯估了中共開門整黨、動員知識分子幫助共黨整風的政策，所以在同年遭到反右運動致命的打擊；從此以後，他們除了寄身中共黨國體制以外，完全沒有其他選擇」(陳永發，1998:973-974)。中共政權在打倒所有的階級敵人以後，無意間已喪失了主要的制衡力量，官僚主義的問題便成為無法解決、且有越來越嚴重的情形。毛澤東因此考慮到動員紅衛兵來改造黨國體制的官僚，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之一。然而，此時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早已不是有客觀指涉的階級鬥爭了。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他認為：「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

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 1966d: 1416) 這種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寬大態度, 反映出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道路。不過, 這個寬大態度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就逐漸轉變。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路線的實行; 更是恨不得消滅一切與資產階級有關的東西。一九六二年中共召開八屆十中全會, 毛澤東提出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 他警告說, 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 且進而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 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毛澤東, 1974: 430-435)。於是, 毛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間, 發動了一連串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¹⁴, 實行全國性的思想改造和整風運動, 提出階級鬥爭和階級教育的重要性, 採取下列一連串措施去推行這個運動: (一) 在學校內用實際的典型材料, 由教師在校內集中地向學生進行革命世界觀教育。(二) 要知識分子直接參加社會階級鬥爭的實踐, 引導學生通過「訪貧問苦」的活動與貧農、下中農交往, 從而了解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的歷史事實。(三) 要知識分子, 包括老師和學生持久地參加集體生產勞動, 跟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和同鬥爭 (姚若冰, 1984: 68-69)。「文革」爆發後, 這些極端、片面的鬥爭觀念, 更表現為到處都是敵人, 認為國內外反動勢力始終企圖顛覆中國政府, 甚至共產黨內部也有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內部不同意見變成階級鬥爭的反映, 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搞得中國大陸國民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 造成全國到處都存在著冤假錯案 (陳光輝, 民 81: 10)。不解決這種透過階級鬥爭的觀念來界定民族主義的具體內容的問題, 不僅整個國家的社會生活, 是不可能正常的, 同時也無法合理的健全中國大陸教育體制與發展。

毛澤東逝世及「文革」以後, 中共雖提出「四個堅持」卻已揚棄以階級鬥爭為綱

¹⁴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 毛澤東表達了民粹主義和反官僚主義的思想。強調這個運動要依靠基層農民組織和農民的主動性, 而不是強調依靠黨的組織系統。這個運動的民粹主義思想可以用毛在一九四一年說的一句話概括:「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用來描述這個運動的口氣, 幾乎就是對未來文化大革命的預言:「這一場鬥爭是重新教育人的鬥爭, 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 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 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 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偉大運動, 又是幹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 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 使我們的幹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 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 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幹部。」而這個運動原先都一直限於糾正農村幹部的具體政治和經濟違法行為的「四清」(「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 後來卻變成無所不包的「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且無人能置身於這場清洗運動之外。這個運動清楚地表明, 毛澤東已把黨本身、特別是黨的最高領導人, 看作是政治和思想不純的主要根源, 鬥爭已沒有調和餘地。隨著這個運動的反對目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化大革命的戰線已無情地劃定。以上請參見 Maurice Meisner 著, 杜蒲譯,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2005 年), 頁 253-256。

的方針，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確立教育為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任務。然而，從「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中共再度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¹⁵列為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點工作，要求全面深入地實施意識型態對學校教育陣地的控制，即在性質上已帶有濃厚的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化色彩，此主要體現於下列三方面：其一，刻意重提「階級鬥爭」。改革開放十年來階級鬥爭在中國大陸社會已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淡化，但「六四」後中共新聞媒體與宣傳部門卻不斷強調，「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存在，在某種條件下激化」、「反革命暴亂就是階級鬥爭存在和激化的一個典型表現」，呼籲學校青年學生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觀察意識型態領域的鬥爭」，並強調辦學的方向，黨委的領導、活動的改造，顯示「文革」時期「政治掛帥」與「紅專」思想的復熾，意味著教育體制改革的倒退。其二，再度提出「堅持群眾路線」。《人民日報》指出「幹部要深入群眾，深入實際，這是實施正確的思想領導和工作領導的前提，決策以後，還要深入到群眾中，做好黨的方針、政策的宣傳解釋工作」；由於主觀認定學生、知識分子「脫離現實」、「脫離群眾」，是中共重提「與工農兵相結合」和「勞動教育」的由來。其三，在輿論報刊上，嚴厲批鬥資產階級的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政治觀，大肆宣揚要恢復毛澤東時期所強調的「雷鋒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甚至於發揚所謂「延安精神」、「井崗山精神」等（黃寬裕，民 82：280）。總而言之，「六四」後中共即加強學校的愛國主義教育，企圖扭轉學校中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資產階級價值觀，灌輸學生調和並處理個人、集體、國家三者的利益關係，同時也處理「個人成才」與「社會需要」間的關係，扭轉脫離社會需要的「自我設計」和「個人奮鬥」思想，改變知識分子和學校師生輕視工農、脫離群眾的「菁英思想」和利己

¹⁵ 「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中共用來說明一種現存的不良社會思潮的用語，冠上「資產階級」的頭銜，說明自由化的階級性質。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中共黨中央召開的思想戰線座談會中，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八五年五月，鄧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更表示：「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一九八六年底大陸學潮發生後，中共對學校教育，無論在知識的傳授和思想的控制兩方面，都很不滿意；所以，開始在學校恢復毛澤東時期的「政治掛帥」作法，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由中共「國家教委」主任李鵬一再指示要把「反自由化鬥爭」當成一九八七年教育工作的大事來看，中共已明顯地企圖加強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意識型態控制。八七年中共「國家教委」公布「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暫行條例」，明文規定，有違反「四項原則」言論者，一律不得錄取。這樣青少年思想是否合乎中共「紅」的標準，就成為能否接受「專」的教育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教育已正式成為中共學校教育的重點。以上請參考：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09-111；唐勃，中共與知識分子（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78年），頁399。

主義的觀念。

三、加強國際反帝、反霸和反「和平演變」的教育

中共所謂的國際主義原本是馬克思用來表述各國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思想，與世界主義之類的概念有根本的區別，所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彼此合作反對國際帝國主義、霸權主義¹⁶的勢力。而當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現實時，它就意味著階級鬥爭和階級教育此一理念的具體落實。在國際政治上，毛澤東將「它表現為最初是『一邊倒』以及後來之『三個世界』的理論，以符應『反帝』鬥爭形式變化的需要。這裡，儘管鬥爭形式有所變化，但都未曾跨越李大釗設想之『階級民族』的範圍」(羅曉南，1997：207)。由於中共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和蘇聯界定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一致性，使得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中共參與了韓戰，即以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的口號動員中國人民；而中共在韓戰中的表現，迫使世界超強美國不得不承認中共在談判桌上的對等地位，從而提高了中共的海內外聲望(陳永發，1998：971)。毛澤東便把韓戰稱是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具體表現。到了一九六〇年代特別是中蘇分裂之後，中共也將蘇聯列為中國新的敵人：現代修正主義。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的中共進入了對外政策最激進的階段。為了促進「世界革命」，中共提出了中國版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將自己看成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新的「思想中心」。一九七四年，毛澤東又發明了「三個世界」理論：第一世界包括美、蘇兩霸，其他已發展國家為第二世界，發展中國家如亞、非、拉丁美洲則是第三世界，兩大超強是當時國際上最大的剝削者，是世界大戰的源頭，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受害最深，他們是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主要力量，而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中國也屬於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在第三世界國家追求國家完整、民族獨立的革命鬥爭中，中共經驗亦即毛澤東思想是他們的

¹⁶ 霸權主義與帝國主義不相同，霸權主義是帝國主義的表現形態，蘇聯霸權主義也正是中共原先說的社會帝國主義，是因它表現如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一樣。若從全球性的國際鬥爭要求出發，中共所謂的反霸權主義主要是在於反抗美國與蘇聯的全球性霸權主義。最明顯霸權主義例子是在一九六八年，在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理論下，社會主義集團入侵捷克斯拉夫，中共直指蘇聯修正主義藉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口號控制並干預他國。中共也指出，美國高喊要限制國家主權與建立國際主權，而蘇聯修正主義者倡導有限主權，與社會主義陣營大家庭的最高主權，兩個掌握霸權的主子唱著同一個調子正好證明兩者是一丘之貉。以上請參見石之瑜，「中共對外關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手冊（下冊）（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91年），頁10-42。

藍圖與『典範』」。換句話說，「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方法來反帝、反殖、反霸，並且達成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目的的第三世界主義」（董立文，民 86：65），儘管是「徹底的主觀隨意論者」，但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確實是通過這種形式而結合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總之，「文革」後期，中共即運用階級民族主義，煽動第三世界及第二世界反帝、反殖、反霸的民族情緒，進行其反美、反蘇的國際統戰¹⁷，開拓其國際活動的空間，增強其國際影響力。

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與國際主義教育，顯然是其歷史教育最重要的部份。在國際主義教育方面，主要重點有三：其一，反帝國主義教育。一九五六年《初級中學世界歷史教學大綱》中強調，在世界歷史的教學過程中必須貫徹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世界歷史教育要達到的主要目標是使學生「必須充分發揚民族自尊心，同時又必須排斥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偏見，反對把愛國主義跟國際主義割裂開來」。當時的國際主義教育帶有明顯的階級鬥爭和意識型態色彩，因為中共強調「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結合是以無產階級立場為基礎的」（陳其，2001：336-337）。從一九五〇年代韓戰爆發以來，中共在全國範圍內全面進行仇美、蔑美、鄙美的帝國主義教育，將階級民族主義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其二，反霸權主義教育。一九六〇年代前期，中共的歷史教育顯出更強的意識型態色彩，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當時蘇聯的「修正主義」的出現和中共內部越趨激烈的「路線鬥爭」背景有關。一九六三年頒訂的歷史教學大綱中，要求使學生「掌握歷史發展規律，理解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培養學生熱愛共產黨、熱愛祖國，樹立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鬥的信心和決心」。「文革」時期，極左思想達到頂峰。北京市教材編寫組編寫的一套歷史教材，就體現了「文革」色彩，歷史教學最大地發揮了與現實政治結合並為它服務的作用。毛澤東語錄成為歷史教科書的編寫的指導思想，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予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

¹⁷ 共產黨人知道，要達到赤化世界的目標，是十分艱難的，所以必須要將建造共產主義的巨大工程，劃分為若干階段逐步求其實現。是以，每一階段都有其不同的「統一戰略」（簡稱「統戰」）策略，以逐步達成其政治目標。而所謂統戰，簡言之，便是確定攻擊的方向（主要敵人），依靠的力量及同盟軍等。當然，統戰之制訂仍依據工作環境之順逆和敵我力量的消長，但其方法則簡單而明確，那就是「聯合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儘量大同盟軍，把主要的敵人迫入最狹窄孤立的陣地，予以消滅。對付敵人，共黨的原則是將敵人區分為主要敵人和次要敵人，先聯合次要敵人，去消滅主要的敵人，並不斷以此一方法來分割敵人，削弱敵人，將其逐一消滅。上述所言，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即是最好的例子，它被中共定名為「國際反霸統一戰線」。這些手法並不是特別用於國際統戰，而是中共的慣常手法。

習的另一任務」；學習歷史的目的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轉引自陳其，2001：337-338）。一九七〇年代，中共特別強調「三個世界」的理論，在歷史教材中要體現聯合第三世界反對美蘇兩霸的宗旨；歷史教學內容包括兩大項：（一）國際主義教育要和國與國間的團結合作結合起來；（二）揭露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罪惡。前者強調於教學時，要系統地介紹幾十年來，中共努力向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亞、非、拉等第三世界提供大量經濟建設的事實；後者強調培養學生認識與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增進世界各國人民之相互了解和友好往來，及加強第三世界之團結合作意義（北京師大歷史教學法教研室編，1988：25-28）。「團結反霸」正是對學生進行國際主義教育的重要核心。

其三，反「和平演變」教育。毛澤東認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戰略；中共建立政權以後，他曾對這一戰略予以注意，提出了反對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問題¹⁸。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在中共內部左派與軍方勢力看來，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策動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滲透人權民主意識等「和平演變」的手段，企圖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陰謀行動（Whiting，1995：295-300）。一九九一年蘇聯「八一九」政變後，蘇共瓦解、蘇聯分崩離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幾近全面潰敗，中共為防範此一「民主化」轉變在中國大陸引發連鎖效應，乃強化其內部的宣傳教育，析陳蘇聯劇變的原因，並研擬「拒腐防變」對策，以統一思想認識，鞏固安定局面。因此，當時中共以為大陸大、中、小學教育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就是要引導師生正確認識國際與大陸情勢變化，普遍地、持久地進行抵禦「和平演變」的教育，提高廣大師生抵禦「和平演變」的自覺性，增強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念，切實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把抵禦「和平演變」的措施、辦法真正落到實處（崔惟林，1992：26）。在大學反「和平演變」教育方面包括：（一）劃清科學社會主

¹⁸ 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和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提出了調整對華政策的新目標，即培養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東山再起」、「施展其自由主義影響」等，這是美國準備交替使用「和平演變」的開端。毛澤東針對這個問題連續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及「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五篇文章，駁斥美國政府的言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白宮發表聲明說，美國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是一個致命的危險」，要用和平的方法使中國得到自由。即用和平演變的辦法，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毛澤東把反對和平演變這一基本戰略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並付諸實踐，其作法是採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提出反和平演變的措施：（一）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二）意識型態領域中還存在著長期曲折的鬥爭，（三）要批判修正主義，（四）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以上請參見許啟賢主編，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61-369。

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界限，清除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二)積極宣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人權觀，以駁斥和否定西方世界資產階級人權觀；(三)牢固樹立陣地意識和爭奪意識，重提思想改造及培養青年一代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黃寬裕，民82：240-244)。在中小學的歷史課程上要加強中國近代、現代史與國情教育，開設在初中二年級的中國近現代史課程，相應地由原來每週上兩課時增加到三課時。而在中國近現代史與國情教育所強調的教學重要內容中，最重要的是向學生說明近百年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民族拯救危亡的鬥爭，以使學生了解帝國主義侵略帶給中華民族深重的苦難，和造成近代中國的落後，加深他們認清帝國主義以經濟、武力侵略的本質，提高他們對帝國主義陰謀以和平演變顛覆國家政權的警惕心與戰鬥心(江澤民，1991：2)。在民族救亡的內容中，應體現民族團結、同仇敵愾、奮發圖強，以捍衛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的氣節，以有助於培養學生抵禦外侮保衛祖國的愛國情操。

參 反思與評析

馬克思主義原本就是西方的產物，尤其是馬克思身處在西方，終其一生所見所聞皆無法真正掙脫出西方的思想觀念和時代視野的束縛，所以他的馬克思主義帶有濃郁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本就是無可厚非之事。而近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建構，是由中國與西方的交往互動過程中形塑完成的，並隨即在西方資本主義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合謀下不自覺的被客體化成為一個相對於西方的他者，且讓西方的思想取代中國的傳統成為民族國家認同建構的內容。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雖然企圖找回中國的主體性，但是受限於時代的制約，反而讓中國更落入一個被西方客體化的後殖民情境之中。這裡，我們將由後殖民論述出發，對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式的愛國主義教育做一些反思與評析。

首先，中共必須面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如何中國化的問題。當中共以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做為其國家建設的最高準則時，其所面臨的理論難題是：(一)馬克思主義往東方擴散中，中共必須處理其西方中心思想所延伸而來的問題，即馬克思主義背後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色彩；換言之，中共一方面接受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也要揚棄其背後的東方論述。(二)在揚棄其背後的東方論述的同時，中共宣稱已使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民族化，並稱在此過程中可以與資本主義切割開來，其實這是一種認識

上的謬誤（李英明，2003：159-160）。（三）對中共來說，社會主義不僅是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另一種發展道路的選擇，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是讓中國從資本主義霸權中獲得解放，且以「主體」而不是客體的姿態走進世界歷史的一種選擇（Dirlik，1997：124）。至於在實踐上，毛澤東主政時期，基於現實的需要，向蘇聯傾斜，但卻無可避免地傷害到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毛在發表〈論十大關係〉後，想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具有解決上述中國人國家認同危機的意義（李英明，2001：92）。但在不能確定中國內涵的社會主義為何之前，他只能用誇大與蘇聯的歧異、區隔及分裂，回歸以農民大眾為思考起點的毛式發展路線，就成為凸顯中國主體性的主導心理傾向，毛的這條路試圖以發動大躍進達成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delinking）的目的，亦即抗拒現代性的滲透，走一國建成共產主義的道路，且以文化大革命將此一設想發揮到極致——即讓中國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的同時，又要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劃清界線。它可說是一種以群眾運動為主的民粹主義的國家認同模式，不過在鄧小平時期遭到了否定，從而被扭轉到國家民族主義的方向上去。

其次，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中隱含著華夏中心主義的問題。用馬列主義來做為國家認同，即是意識型態的認同；用意識型態認同來代替國家認同，就會在開放的現代民族主義中增加由意識型態推出的文化和制度的認同要求。而忠於這些內容又常常會和多元開放社會發生矛盾。「馬列主義把共產主義當作全人類的普遍理想，落後的中國可以通過建立最先進的理想社會再次成為人類價值之體現」（金觀濤，1994：139）。這時候，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新世界秩序的中心，因此只要具備一定的條件，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支配下的國家認同，就會變成一種類似於傳統華夏中心主義的結構，金觀濤將其稱為「新華夏中心主義」。新文化運動後期，在知識分子中便已發現了新華夏中心主義的萌芽。如李大釗曾明確地表示，中國之所以要走俄國人的道路，就是因為馬列主義可以使落後的民族儘快轉化為最先進的國家。文革時期，新華夏中心主義又復活了。紅衛兵反對西方並不是出於簡單的捍衛中國民族國家的利益，在他們眼中管它是外國的、中國的，只要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統統在掃除之列。排外的根據並不是民族國家至上，而是一種類似華夏中心主義的普遍天道。眾所周知，文革中毛澤東思想已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而中國是體現這種普遍天道的唯一國家。正如傳統的華夏中心主義把中國視為世界道義的體現一樣，文革時

的中國也成為新的普遍道義的代表。顯然，道義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無產階級革命理想和現實革命的唯一正統理論，因此中國也立即獲得世界革命中心的稱號（金觀濤，1994：140）。根據毛澤東對三個世界的劃分，美蘇兩霸是第一世界，歐日等是第二世界，最革命的是被壓迫的第三世界。如同藩夷分佈在中國四周那樣，三個世界也按其革命性強弱依次分佈在世界革命中心——中國的周圍。後文革時期，中共再次明確以生產力發展為社會主義是否成功的標準，新華夏中心主義衰落，其原因：一是改革開放承認中國有必要學習西方，也就放棄了中國制度最優的心態；另一是中共對外關係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變為以民族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第一，也不熱衷於輸出革命了。

此外，對毛澤東來說，「國家」、「民族」的認同與否也就視個人所出身與認同的「階級」而定了。根據學者徐貴的觀察分析，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末，中國大陸的社會身分系統的區分尺度是「階級劃分」，這種階級劃分是與某種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聯繫在一起的；它的劃分則由社會生產關係逐漸轉化為意志論，再轉化為血統論。也就是說，「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的完成和生產資料占有情況的根本變化，階級劃分逐漸失去了它的物質基礎；但是，由以往階級分析所確立的身分系統仍然被保留了。階級分析作為政治等級在中國的存在也表現得越來越清楚」（徐貴，1996：194），徐貴接著繼續指出，中國大陸社會身分系統此時已出現了一些特徵：（一）它越來越以政治權力而不是經濟能力為身分標誌，中共幹部與群眾界限的加深，以及官僚體制和等級體制的確立，造成了一個與嚴格的「待遇」區別相聯繫的複雜身分系統。（二）身分區別越來越朝意志論的方向發展，「思想」和「立場」越來越成為確定人們身分的標誌。一個人可以出身「工人階級」，也可以在中共黨內或政府內擔任職務，但這些優越的身分卻可以因為他在某個問題上的「立場錯誤」而全部消失。他會因此而獲得「反革命」或「右派分子」這樣的壞「身分」。（三）身分甚至變為一種「種性等級」和「血統」特徵。一個人的身分不僅影響他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生存處境，而且還影響到與他有關聯的家人親朋。身分是一種從家庭承襲而來的血緣特性，一種在人出生前已經設置好了的社會地位。「隨著中國身分系統的『思想立場』化和『家庭出身』化，身分區別實際上已經從描述性的『差異區分』轉變為定性式的『道德類別』」（徐貴，1996：195）。在這樣的身分區別中，社會群體的政治權力、經濟地位、性別、民族等方面的具體區別已經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永遠同當下官方權威及其現行政策始終保持一致。正

因為毛澤東濫用「階級」這個概念，所以才產生了許多「左傾」的思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的禍害。

第三，中共的國家主權觀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一直遵守著威斯特伐利亞的絕對單一化的主權概念。眾所周知，近代西方的主權概念，延續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的主權原則¹⁹，「反映了古典霍布斯時代的主權概念，也反映了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的觀點，即是學者稱之為『硬主權』的主權觀念。與霍布斯式主權觀念相對立的，是由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觀點下所發展出來的『軟主權』或稱為『互賴主權』的概念」（李英明，2001：48）。此外，主權的觀念必須與國家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主權的存在與行使必須透過以國家為載體，才能彰顯出其意義。從以上的角度觀察中國，基本上沒有近代國家所建構出的主權與國家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中共建立政權後，才有效建構威斯特伐利亞的主權概念，表現出近代國家的行為。毛澤東時期，中共的主權觀是很典型的霍布斯式的硬主權概念；尤其自「萬隆會議」以來，中共即堅持「不干涉內政」的主權至高原則，走現實主義途徑，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追求國家利益。對於西方的自由主義主流所理解的軟主權，中共是抱著相當矛盾的情結，即使在後毛澤東時期，中共對國家主權的認知，仍遵循著「國家主權至上原則，內政問題屬國家主權範疇，絕不容他國進行干涉」的看法。鄧小平便把主權視為國家的生命，強調主權問題沒有回旋的餘地，是不可以討論的（劉建明，1999：1）。至於人權問題，中共則認為人權問題從屬於國家主權，各國不可干預其他國家人權，反對「人權高於主權」、「人權無國界」的主張；因此，中共批評西方國家藉促進人權的名義，要求他國實行人權政策，便是一種破壞其國家主權完整、干涉其內政的行為，因為中國人民在歷史上多次遭受外國侵略，深知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實現人權的根本保障（黃寬裕，民 89：90）。中共這種國家主權觀，其實仍未揚棄威斯特伐利亞的絕對單一化的主權概念。然而，隨著資訊社會的發展，全球化時代已經來臨，但包括中共在內的一些國家，其國家主權仍停留在古典階段上，這不但被人認為是當代國際衝突的根源，同時也已不符合時代潮流的趨向。

¹⁹ 威斯特伐利亞的主權概念，主要強調兩個重點：（一）主權與國家是兩個同時並存的概念，國家是作為主權行使的載體，也是作為主權體現的操作工具；（二）各主權國家間具有其平等性，它們在國際間的地位是相同的。關於第二點，一直到十九世紀時，才成為西方國家間互動交流所彼此遵守的原則。第一點內涵中所表明的是國家擁有確定的領土疆域，即國家主權是透過領土疆域的固定性來展現。以上請參見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兩岸關係（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頁48-49。

第四，意識型態教條與發展現代化的衝突問題。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在中共的意識型態教育中，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特質諸如民粹主義、群眾路線和自力更生等一直起著主導作用。而無休止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推動意識型態走向「左」的極端，引起更強烈的排外，致使中國與西方國家隔絕。因此，當中共統治危機和排外並發時，便不可能發展現代化；是故，推行現代化必須壓制排外，請參見圖 4-1。雖然排外之轉入低調於一九七〇年代初已見端倪，「左」和排外的終止卻是在七六年毛逝世和「四人幫」被捕後。從此鄧小平竭盡全力來維持政治安定，減少統治危機，強調安定團結，並在意識型態規範體系上進行修正和調整，但其結果不僅未能實際上解決毛澤東思想這個意識型態和包袱，反而是因為前後意識型態的內在矛盾，使得修正與調整後的意識型態，更難發生規範的功能。其主要矛盾有：(一) 在實踐中對馬列主義做了某種程度的發展與補充，實質就是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卻又強調馬列主義具普遍真理性；(二) 對毛思想做了相當的批判與調整，卻又強調仍堅持毛思想的原則；(三) 在主張社會主義優越性時，卻又要藉助資本主義手段來發展社會主義，從而否定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說法；(四) 在藉助資本主義手段時，卻又進行批判資本主義會產生「精神污染」，有導致「和平演變」的危機（朱新民，民 79：11-12）。另外，中共的改革從一開始就與「四個堅持」處於矛盾之中，儘管改革派信誓旦旦地宣稱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可是，他們許多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均已違背了「四個堅持」。正因為鄧小平路線的內涵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型態相互矛盾，終致中共的統治日益陷入不可避免的重重政治社會危機中。換言之，自改革開放後，鄧小平與改革派採取的是「政經分離」政策，即在政治上不斷「反右」加緊意識型態對社會的功能控制，經濟上則不斷「反左」，並力言「不堅持改革、開放、搞活就沒有出路」，形成了學生對「四個基本原則」產生懷疑，對「四個現代化」缺乏信心，顯示了意識型態教條與時代潮流的衝突。

再者，就強調階級鬥爭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教育的難題而言，毛澤東激進的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大陸帶來相當嚴重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負效應。鄧小平則不一樣，他在上台之初便已瞭解到一味逃避面對資本主義問題，只會加速自己的崩解與滅亡，他的改革開放其實便是一種饒富意涵的「去殖民化」作法。不過，「六四」前後，在中共保守派的主導下，大力加強思想上反

統 治 危 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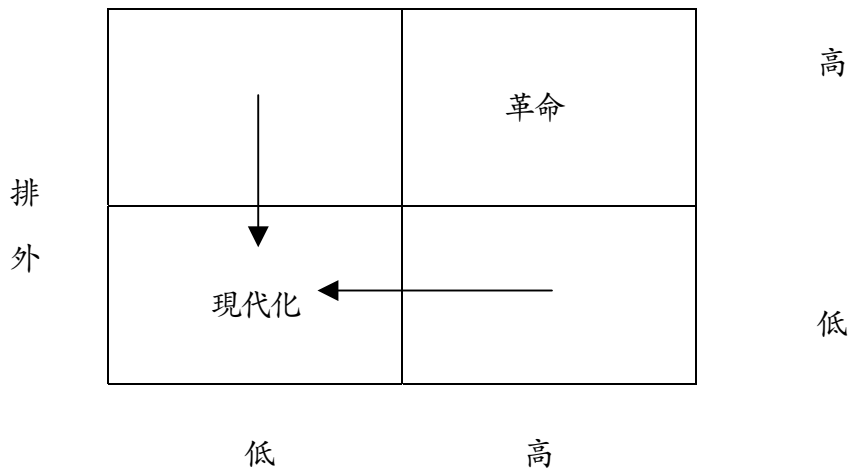


圖 4-1 現代化模型

資料來源：廖光生，排外與中國政治(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77 年)，頁 294。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甚至用毛澤東時期「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影響和衝擊經濟工作這個中心，也因此才引來了鄧小平於一九九二年一月的南巡講話。事實上，鄧小平並非不「反資」，他說：「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只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後果極其嚴重。」(鄧小平，1993：35)如今，中共已規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正面教育為主，不搞運動，不妨害改革、開放、搞活政策。我們認為，中共若要認真看待這個問題，應該建立一個重要的觀念，那就是揚棄殖民主義並不等於可以否定資本主義，中共必須體認到一個現實，即在後殖民時代，人類還是必須面對如何與資本主義相處的問題，這個現實依然被涵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此一載體中，人類目前仍無法與資本主義切割開來，這是人類無法逃避的一個難題。所以，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國，絕不能再簡單的殖民主義邏輯來看問題，而要使自己真正進入「後殖民意識」覺醒的時代。李英明指出，「資本主義全球化隱含著一個『一體化』的資本主義邏輯，伴隨此邏輯而來的取消各國家間差異性的要求，但這些國家卻又是具有差異性、獨立性的相對實體，因此形成一種一體化和特殊化之間的張力」(李英明，

2003：157)。由此看來，我們所說的「後殖民意識」的覺醒，即是一方面要求自己國家差異性、獨立性的同時，一方面要去處理跨越資本主義全球化、一體化下的爭議的能力，處理差異性和一體化之間張力的能力。

第五，階級民族主義的對外政策問題。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中具有反帝的排外思想，它曾經成為中共國際行為最重要的組成部份，至一九七〇年代已急劇衰落。這是因為七〇年代以來中共提出四個現代化和五〇、六〇年代的反帝思想政策顯得格格不入：(一)在五〇年代，中共政府執行一條強硬的反西方政策和「一邊倒」的對外政策。反西方情緒在人民中間盛行，構成了中共反帝思想的感情基礎；而中共的現代化，在極大程度上意味著西方化和工業化，因為不論是工業的現代化還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都需要向西方國家學習。(二)反帝活動曾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建設中階級鬥爭的一部份，這在一九六三年的三大革命運動中，表現十分明顯；而四個現代化被稱為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一場大革命」，它需要全體人民團結一致，階級鬥爭在中共政治教育中已失去其重要性。(三)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反帝思想曾被用來發動群眾，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支持社會主義建設，就是支持反對帝國主義。而在中共進行四化中，工業和國防現代化並不依靠群眾路線，它強調管理、技術與優先考慮武器裝備的改進等，這同以往毛強調在戰爭中「人的因素第一」和動員群眾的觀點相去甚遠（廖光生，民77：260-266）。因此，到了八〇年代特別是九〇年之後，即使傳統上狹義的「國際主義教育」已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遷，正在向「國際意識」和「全球觀念」教育的方向轉化（陳其，2001：362），但階級民族主義仍未能加以揚棄。這就是說，中共在意識型態崩解的危機下，以一套將本土化與全球化具體實踐結合的意識型態來取代傳統的理念型意識型態，藉由全球化浪潮的力量來增進本土意識的發展，同時也藉由本土意識的成形來對抗全球化浪潮下的另一波「看不見的殖民」；以反「和平演變」的教育來激發出中國大陸群眾的愛國主義精神，亦即用愛國主義教育來對抗西方思潮的「和平演變」，此乃是何以中共執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始終必須在「左」、「右」之間擺動，而無法明確其路線定位的原因。

總括而言，中共這種以階級民族主義為主軸的愛國主義教育，主要是在毛澤東時期建立起來的。而毛的階級民族主義，毫無疑問地蘊含了巨大的反西方、排外的潛力。不過，後文革時期以來中共確定其內部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

間的矛盾，且把工作的重心整個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中，加上隨著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政經體制和社會結構的變遷，毛澤東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易有著力點，其傳統意識型態也不易被構連。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這種極端的情緒及其中蘊含之『華夏中心意識』和『義和團情緒』從未真正被清算過，反之卻以種種不同之形式（如階級民族主義）保存下來」（羅曉南，1997：210）。換言之，今天這種階級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還有其影響力和號召力。在中國大陸有了一定的綜合國力、有了經濟上的長足發展之後，一種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情緒似乎尤其有足夠土壤而發展蔓延；在中共的官方意識型態和現行政治體制下，更難以避免種種充滿極端民族主義情結的政策思路會主導國家決策的悲劇。「中國威脅」，也許最終被證明不過是一種虛構的神話，而這種證明並不是由於中國人對於國際社會的善意，亦不是出自「中國永遠不稱霸」的宣告，而是來自中共的階級民族主義。由於階級民族主義的作用，其所帶來的可能結果，是在國際戰略中堅持與西方對抗；而在國內政治中，則不免加強反「和平演變」的愛國主義教育，排斥肇源於西方的現代化觀念和制度。這種思路要求中共放棄對外開放與制度變革，並通過強化中共獨特的意識型態與政治制度來與西方相抗衡，如此中國大陸將失去繁榮富強的機會。是以，中國大陸到底要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才能達致既不對抗，又不封閉；既能學習西方而自強，又能不被西方牽著鼻子走，這似乎已成為一個巨大的挑戰：它在挑戰中共的決策制度和政治體系，也在挑戰中國人的智慧和能力。

第二節 以國家民族主義為依托的愛國主義教育

中共的愛國主義始自建黨，傳習於列寧（董立文，民 86：58-67）。改革開放後正式成為中共意識型態的主要旗幟，其內容隨著二十多年來不斷被中共刻意的充實與強化。換言之，毛澤東逝世及後文革時期，中共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點在撥亂反正、清理左傾錯誤，並確立教育為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在文教方面放鬆了意識型態的控制，對於課程，和以往相比，顯著地減少了對革命精神和階級鬥爭的強調，而增加了法律部份，和加強配合有關改革開放的建設發展目標。可是，由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引進西方市場經濟制度，再

加上蘇聯和東歐共產政權的崩解形勢下，對學生思想造成嚴重的衝擊。中共當局乃採取管制的措施，如前節提到反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也同時加強了中小學的德育工作，堅持學校的社會主義性質，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遵循黨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指導方針，繼而為振興中華，實現四化努力（謝均才，1999：188）。如一九八三年《關於加強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意見》、八八年《關於改革和加強中小學德育工作的通知》、《小學德育綱要》、《中學德育大綱》、《小學生日常行為規範》以及《中學生日常行為規範》等；而八九年民運帶來的衝擊，使中共當局判定十年最大的失誤在教育方面，認為動亂充份暴露這個失誤的惡果，於是更要加強和改進中小學的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特別是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如九四年《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便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以利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改革開放和祖國統一（人民日報，1994：9，6）。一九九六年十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上講話時，指出：「為了把我們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必須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進一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我們堅持的愛國主義同狹隘的民族主義是有本質區別的。」（江澤民，1997：3）是以，鄧小平及鄧後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已經從階級民族主義傾斜於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

壹 國家民族主義

一般而言，學者將民族主義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另一種是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²⁰（ethnic nationalism）。而何謂國家民族主義？李興認為，國家民族主義「是某個民族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在國際關係中表現出來的帶有傾向性的思想、情緒、態度，或推行的運動和行為」；「它反映了某個民族國家與其他民族國家以及當今世界的關係，是民族國家存在的基本方式，因而是一種能在國際政治中發揮作用和影響的力量因素」（李興，1995：75）。李英明則認為，國家民族主義是指「在承認不同種族的差異的前提下，要求不同種族要融入

²⁰ 國家民族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民族建構，種族民族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國家建構。亦即，民族主義的實質內涵就是透過國家機器去建構民族，或是以種族或民族為基礎去建構國家。易言之，民族主義就是讓種族或民族與國家形成兩位一體的關係。至於種族民族主義是指什麼呢？它企圖通過要求政治上的自主性，如建構國家，來強化、維護和凸顯本身種族的特性；這就是說，它要讓種族從一個以血緣為基礎的文化實體，進一步變為政治實體，亦即成為一個民族。換言之，種族民族主義主要是要求種族不能只是單純的作為文化社群，它應進一步變成一種以國家建立或以政治自主為基礎的政治社群。以上請參見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60-62。

一個更大範圍的『民族』旗幟之下」，以中國為例，漢、滿、蒙、回、藏與少數民族，他們在族群上雖有差異，但國家民族主義者會要求他們跨越族群的差異，並透過效忠被宣稱能代表更大範圍的民族集體意志的國家機器，進而促使他們認同、融入這個更大範圍的民族之下（李英明，1999：61）。綜合學者們的看法，國家民族主義是以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為基本單位，以民族國家利益為核心的，亦即它是以民族國家作為其力量和組織載體，在國際關係領域確認、捍衛和維護民族國家利益和主權獨立，乃至擴張自己國家利益的民族主義思想。中共在建政後，透過國家民族主義的訴求，不僅使其政治統治正當性取得辯護的基礎；同時進一步「要求中國大陸內部各種族和族群效忠中共政權，跨越各種族和族群的區隔，團結在所謂的中華民族的大旗幟之下」；在後毛澤東時期，中共稱這種國家民族主義為「愛國主義」，「以便和近代以來伴隨民族國家的形成而發展的民族主義或中國傳統中的漢族沙文主義區隔開來」（李英明，1999：79）。這裡，我們將論述鄧小平及鄧後時期中共如何透過國家民族主義的途徑去處理其內政和對外關係。大致說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陸，在國家民族主義主導下，具有下列四項重要特徵：

第一、政治上依然堅持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在階級民族主義昂揚的時期，中共並沒有西方意義的民主，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如「階級性」、「群眾路線」或「民主集中制」，都是無關於一般憲政民主國家的公民所熟悉的那些原則或制度：「正當法律程序、司法獨立、制衡、基本人權」（羅曉南，1997：211）；而即使在一九八〇年代為了配合經濟發展所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曾強調要改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本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和管理國家的權力；在選舉制度方面，要充分尊重選舉人的意志，保證選舉人有選擇的餘地。至於加強社會主義的法制建設，也強調要使之貫穿於改革的全部過程，大凡應興應革的事，盡可能以法律形式制度化，務求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除了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外，還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趙紫陽，1987：8-10）。儘管有了這些改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法制還是不能與世界的先進國家相提並論。中共官方談到民主或法制，總是冠以「社會主義」的稱號，以示有別於西方社會的憲政民主。中共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其實是共產黨領導下由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況且中共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政府權力還未分開，以致可以互相制衡，防止濫用；加上官員不是經由普選產生，缺乏了他們必須向

人民負責的制度保證，濫權情況也時有所聞，凡此種種，都在說明中國大陸現行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只能說是「為民」(for the people)，不能說是「由民」(by the people)。口號是「為人民服務」，與儒家傳統的民本政治一脈相承(張德勝，1997：290)。由此可見，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透過國家民族主義的途徑，積極從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建設，但研究中國的學者認為，中共只是放鬆經濟方面的管制，在公民政治權利方面仍無任何實質保障可言，諸如中共對「天安門事件」、「西藏人權問題」乃至近些年「法輪功問題」的鎮壓(Andrew J. Nathan 著，柯洛漪譯，2000：375-377)，都反映出中共壓制公民權利且不尊重人權的本質，因此，中共的人權狀況仍是無法達到現代憲政民主國家的標準。

第二，不過，也有學者指出，現行的開放政策與市場經濟體制，使得中共的國家民族主義有可能往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內涵的孫中山式的民族主義發展²¹。首先，據威爾森(Richard W. Wilson)的研究顯示，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共對法律的文化意義已有相當的改變，亦即從毛澤東時期對法律的「責任義務」式的理解轉向目前「權責相符」的法律觀。前者對國家(政府)和民族(人民)之間的關係，強調的是階級地位、公民責任，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根本就不存在，「即或到了一九七九年後期，『人權』亦不被視為是人本來應有之權利，而是國家賦予和規定的權利」；但從八〇年代之後，中國大陸的家庭，「過去基於年齡、性別的責任取向的傳統觀點，越來越為新的強調『平等』作為團結基礎的權責觀所取代」，而在八九民運中，更表現為學生要求憲政公民權並和中共當局進行平等對話(羅曉南，1997：212-213)。其次，中國大陸二十多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產生了一些有利民主化的因素，如「經濟發展本身的較高水平、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城市化的發展和信息的流通傳播」等。另外，在過去階級民族主義的思路中，「市場經濟、商品交換都是嚴格禁止的，與外國人從事經貿活動者」，都會被冠上「漢奸」、「買辦」或「階級敵人」的罪名，如今中共接受孫中山式的政治民族主義，「接受外資、技術並兼採市場經濟且日益擴大其範圍」，這已明顯放棄毛澤東時期「經濟上的反帝」(羅曉南，1997：214)。至於孫中山也反對這種「盲目排

²¹ 筆者較贊同羅曉南的看法。他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前進，中共已逐漸淡化毛澤東民族主義的階級色彩，並開始轉而收編些許的文化民族主義成素，同時另一種具有現代政治民族主義內涵的孫中山式的民族主義，也在政經條件日漸具備下，悄悄成為中共意識型態的一部份。請參見羅曉南，當代中國文化轉型與認同(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210-211。

外」的階級民族主義，他認為，民族國家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只有與西方國家經濟合作，「才能自我保全、自我發展」。然而，他為何會採取開放的、現代的政治民族主義立場呢？其根本原因是孫中山對「帝國主義」的定位與馬列主義者不同：前者是「將『帝國主義』看成是某些民族之領土擴張野心及追求國際安全的這種『政治表現』」；而後者是「將它看成是『經濟』變數之必然作用或『資本主義之最高形式』無可避免的結果」（羅曉南，1997：216-217）。正因為孫中山始終堅信國際市場經濟本質上是非剝削性的，所以他才能擁有一種較具包容的心態，走經濟與帝國主義者合作、且兼顧政治民主化的民族主義發展道路。

第三，中共在國家民族主義的支配下所實行的民族政策，遠較國民政府時期開明，但卻仍未擺脫晚清以來強烈的漢族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的羈絆²²。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後，在形式上是國家民族主義取得勝利，不論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表面的政策而言，都是把國族的觀念擴大，容納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以平等合作的地位，共同形成新的中國；但骨子裏，國族觀念仍然是以漢族族群中心意識為主體。一九四九年中共政協「共同綱領」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同時規定：「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吳家麟主編，1992：57）。一九五〇年代初，中共根據史達林的「民族」定義，進行少數民族識別工作，總計辨認出 55 個少數族群。中共據此於五四年的第一部憲法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民族自治區域劃分為「自治區」、「自治州」及「自治縣」三級，並賦予少數族群在文化、語言與日常行政事務的高度自治權力（吳家麟主編，1992：63）。同時，中共對於各級國家幹部「漢族沙文主義」的傾向，也是力加抑遏，百般防範。然而，中共宣傳機器對於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之族群關係的再現策略，依然是由「先進／落後」、「現代／傳統」的二元對立範疇所構成。少數族群只有在先進的漢族協助、指導下，才能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使命，成為中國「民族」的合格成員。這種族群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明白顯示出種族民族主

²²從晚清以來，嚴夷夏之防，以血統區辨族群的族類觀，因應反滿革命的現實政治需要，為漢族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所急遽動員，並與來自西方的種族概念相揉雜，成為劃定中國民族邊界最為有力的標誌。從一九〇九年國籍法的制訂，直到一九八〇年中共政府正式取消雙重國籍的規定，血緣始終是定義中國國家成員資格的法定標準。以上請參見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台北），第 3 期（2002 年 12 月），頁 103。

義在當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潛在力量（沈松橋，2002：84）。一九八二年的中共現行憲法和八八年的小部份修憲中，除有「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和「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等規定外，還特別強調：「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因此，「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製造民族分裂的行為」（吳家麟主編，1992：86、90）。但在現實的政治經濟運作中，中共仍是以漢族為中心的，且企圖使少數民族能夠和漢族同化。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中國知識菁英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很具影響力，而學界對這理論的詮釋，特別是有關「一體」的理解，時而透露出傳統漢族中心的族群意識（費孝通主編，1991：1-36）。總之，從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的種族民族主義運動，一直未曾間斷，且對中共官方的國家民族主義或以漢族為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構成嚴重的挑戰。

第四、後冷戰時代，中共更加倚賴國家民族主義來處理對台政策和對外關係。從現實政治來說，中共一直認為美日兩國對台灣具有帝國主義或分離大中華之野心，而台灣又在具有台獨思想的民進黨主政之下。因此，為了防止台獨的發展，國家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思想基礎；在愛國主義的口號下，兩岸互動的問題被歸類為「祖國統一大業」的問題，把兩岸分裂分治的事實定義為「台灣問題」。此外，在冷戰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尖銳對抗退潮、社會主義國家崩潰與改革開放，中共自身意識型態的「純潔性」危機，都使得中共轉向強調國家民族主義，作為凝聚國家內部向心力、忠誠度的工具。不但如此，此種民族主義情緒，亦產生轉移國家內部矛盾，結合國內不同力量一致抗拒外敵的巨大力量，更進一步增加中共領導人對國家民族主義功效之迷信。是故，中共透過愛國主義之揭櫫，將「台灣問題」與反美帝的文宣結合，以追求中國人民之團結及一致對抗外來力量的干預，已然成為中共處理兩岸關係的基調。譬如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危機，一九九九年美國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和二〇〇一年美中軍機擦撞事件（宋國誠，民 91：31），都可以看到中共想利用國家民族主義來反美國霸權，並藉此來排除外國力量干預所謂的台灣問題。然而，在兩岸關係上，中共無法以國家民族主義來處理，也不能按照其宣稱的「一國兩制」模式來解決。因為台灣不是港澳，且台灣民眾至今或是可見的未來都不可能輕易認同中共政權。台灣在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在上層建築中也在進行新一波的國家民族主義重建工程，透過要求效忠一個後戒嚴時代的國家，跨越族群的區隔，團結在一個涵蓋

台澎金馬的台灣民族之下」，雖然作為政治效忠對象的國家，官方仍將其稱為中華民國，但與兩蔣時代奠立在所謂「正統性」訴求的內涵已有所不同（李英明，1999：81）。至於中共在對外關係上，特別在面對國際衝突或危機時，「雖然在形式上是按國家民族主義途徑來處理，但在實際進行動員時，卻仍是以漢族為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訴求」；換言之，「在面對國際外來衝突時，中共雖然以強調維護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作為主軸，但在現實上，卻是透過種族民族主義訴求的動員作為後盾」（李英明，1999：80）。總之，中共在現實層面上，已很難以國家民族主義來處理對台政策和對外的關係。

最後，我們認為中共在毛澤東時期的民族主義訴求，基本上還沒有和世界近代以來民族國家的形成而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典範完全銜接；這種典範，「不只承認民族國家形式上的對等性，而且承認在其主權領土內的人民權利上的對等性，而不只是從屬於國家機器之下，必須受國家機器絕對支配的被動性客體」（李英明，1999：83）。不過，若從鄧小平和鄧後時期來看，中共的國家民族主義在實質的內涵意義上，特別是經濟自由化方面是有其實際的進步的，其具體的方向是有逐漸與近代的民族主義合拍；這也就表示，當中共的國家民族主義與具有現代意涵的民族主義合拍時，才算真正代表中共被納入國際體系之中，真正成為國際體系的重要成員。

貳 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中國大陸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共把這個時期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²³。對中共來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方針的確立，使中國大陸在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領導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共雖然將「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官方的主流核心意識價值，不過在實踐性的方針中，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卻把共產主義思想中的理想、信念、風格、道德等與愛國主義在宣導與教育中結合起來，期能以愛國主義為中介，動員和組織人民，朝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前進。可以說，鄧小

²³ 中共於一九八七年「十三大」才正式由趙紫陽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將一九五六年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點」，二〇五〇年稱為「終點」。中共以回溯的方法，把一九五六年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點」，旨在糾正往昔認識社會主義的偏差，並藉以確定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教育等體制改革的重點，並論證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決策的正確性，作為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改革開放的補充理論。因此，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實質意涵的時間起點應為一九七八年。以上請參閱吳榮鎮，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教育價值取向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89年），頁8。

平和鄧後時期，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基礎，並非「四項基本原則」，而是「愛國主義」（吳榮鎮，民 89：257）。為此，中共二十多年來在各級學校的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力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工作。這裡，我們將分「用愛國主義教育來挽救共產主義危機」、「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部份，來敘述鄧小平和鄧後時期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一、用愛國主義教育來挽救共產主義危機

一九八三年七月，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發出《關於加強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意見》，正式將愛國主義納入了政治宣傳與思想教育工作的領域。中共在這份文件中指出：「經常地進行和加強愛國主義的宣傳教育，培養全體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愛國主義精神，提高他們的愛國主義覺悟，是建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項重要認識，是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項基本內容。」

（人民日報，1983：7，2）可以說，這是中共在一九八〇年代初中期意圖用愛國主義教育來挽救共產主義危機，而以愛國主義作為走向共產主義的一個階梯；同時，也將愛國主義教育內容肯定為「三熱愛」——熱愛黨、熱愛祖國和熱愛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實踐的錯誤，削弱了以共產主義作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同時降低了以共產主義作為教育民眾認同中共政權的意識型態功能。面對此一危機，中共突出愛國主義自有其特殊的目的。中共深知，若直接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必然會引起青年學生的極大排斥；所以中共想出一套辦法，間接的進行共產主義教育，那就是「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中共在一篇題為「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重要主題」文章中，說：「愛國主義，這是召喚中國各族人民為祖國的統一、繁榮、強大而獻身的一面偉大旗幟。在黨的各項思想教育工作中，都應當把這面旗幟高高地舉起來。」（王士菁，1983：14）中共的這一轉變，由愛國主義的追求而促使青年學生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是比起直接進行對馬、列、毛等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要來得有效。愛國主義對中國人來說，它的確是無法估量的精神力量。

在中國大陸各級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愛國主義」的核心是共產主義思想。中共認為：「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道路，也是一切愛國者正

在走和還將繼續走下去的道路。……今天講愛國主義，就是要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祖國。以共產主義為指導的愛國主義教育，可以使人民群眾的愛國觀在民族情感的基礎上提高、昇華，把個人的命運、前途，同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結合起來。這樣，廣大群眾就可以從愛國主義出發逐步接受或追求、信仰共產主義。」(人民日報，1983：7，2) 由此可知，「愛國主義」教育的提出，就是做為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與中共之間的整合概念，透過他們對國家強盛、民族文化認同的情感因素，轉化為對共產主義的信念重建。

況且，如以「愛國主義」這一面旗幟與「共產主義」相比較，那麼「愛國主義」所包容的範圍是要大的多了。在社會主義的體制下，由於人民各自的生活閱歷、文化素養、認識條件、實踐經驗等的不同，他們的思想水平和覺悟程度是不同的；而中共為了針對這種不同、接受教育的能力也不同等客觀因素，提出要以「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為起點，並且特別眷戀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一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中，將愛國主義作為一項重要的教育內容，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特殊的作用。它因為有長期的歷史傳統，在社會輿論、社會心理上有深厚的根基，因而比較易於為各種不同出身、不同社會經歷、不同職業、不同民族、不同年齡、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思想覺悟的廣大範圍的社會成員所接受、所理解(人民日報，1983：7，2)。職是之故，中共強調「要堅持從愛國主義教育入手，提高人民群眾和青年的愛國主義覺悟，並以此為起點，把思想政治教育深入下去，步步上升，逐步地把廣大愛國者提高到共產主義思想的水平」(人民日報，1983：7，2)。

不過，誠如江澤民所指出的：

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過去，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比較膚淺、簡單。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們對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學上的預見，但未來的事情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我們要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2：46)

芾

因此，目前中共雖在理論上，並未放棄建構一個「人人各取所需，各盡所能」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之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也仍為教育決策者所尊崇的終極目的；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提出，又只是達成此項終極目的的中介手段與過程(吳榮鎮，

民 89：173-174)。惟在實踐上，鄧小平與鄧後時期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實際已從共產主義進程中退卻。

二、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其實，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共所推行的改革開放，在實質意義上，就是對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質疑，因此，鄧小平不得不另循其他的途徑來維護其政權的意識型態合法性，很顯然的，他選擇了愛國主義。如果說，愛國主義在鄧小平時期只是中共政權在意識型態領域所使用的擋箭牌，那麼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後，中共已將「愛國主義的內容轉守為攻擴大其意涵，或是說，正式的將愛國主義作為『後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時期中共意識型態合法性的主要內容」(董立文，民 86：67)。而這個轉變從中共中央印發《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即可獲得瞭解。

首先，愛國主義教育的指導思想，已由共產主義轉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²⁴。在《綱要》的前言部份，強調「中華民族是富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愛國主義是動員和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鬥的一面旗幟，是推動我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人民日報，1994：9，6)。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把愛國主義這一面旗幟抬高到「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但佔全黨指導地位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已不再提及；而在鄧小平理論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四項基本原則」，則又被忽略了。從《綱要》的前言中，除了用「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一句帶過外，中共似已拋棄對愛國主義作階級分析方式的解釋，甚至更脫離了共產主義的理念，完全的在國家民族主義的範圍內詮釋愛國主義教育(董立文，民 86：61)。如果對於這個趨勢的分析沒有錯誤的話，那麼這正標誌中共意識型態的重大變化，就是說，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已從階級民族主義轉向國家民族主義。

其次，關於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綱要》明確指出，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目標是：

²⁴ 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進程中，在總結毛澤東時期實踐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並借鑒其他國家社會主義的成敗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過中共的「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都被中共當作一面旗幟寫在其黨章上。到了「十五大」，中共更把它明確稱為鄧小平理論，並明確規定為共產黨人的行動指南。以上請參見李康平、張吉雄著，鄧小平德育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138。

「要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把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引導和凝聚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上來，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的共同理想團結奮鬥。」（人民日報，1994：9，6）為此，《綱要》規劃多種不同的愛國主義教育新形式，如建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創造愛國主義的社會氛圍，提倡有助於培養對國旗、國歌、國徽崇敬感的必要禮儀，大力宣傳愛國先進典型等，這些都是說明了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在現階段已傾向於國家民族主義的重要表徵。

再次，關於愛國主義教育的任務。在這份《綱要》中，中共特別強調「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原則」，第一條明確地指出，「愛國主義教育必須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必須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有利於促進改革開放，必須有利於維護國家和民族的聲譽、尊嚴、團結和利益，必須有利於促進祖國統一的事業」；第三條強調，「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堅持重在建設的方針」；第四條也特別表示，「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原則」（人民日報，1994：9，6）。這些原則的說明，反映出鄧後時期的國家民族主義發展，仍要以繼承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為重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第四，關於愛國主義教育的特點。另在「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原則」第五條，也指明「愛國主義必須突出時代特徵。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新時期愛國主義的主題」；後段又強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三位一體，有機地統一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之中」；第十五條，特別說明「愛國主義教育是全民教育，重點是廣大青少年」（人民日報，1994：9，6）。這很清楚地顯示，中國大陸各級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已從共產主義立場轉移到民族主義的立場，亦即教育青少年學生排斥個人主義、強調集體主義，同時把民族國家作為集體效忠的對象，而中國共產黨就是這一個民族國家的代表。

最後，現階段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所強調的是：堅持以人為本，教育和引導青年學生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養成高尚的思想品質和良好的道德情操，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

院公報，2004：7-8)。這裡，值得正視的是，中共在「十六大」時，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²⁵。這一變化從表面上看似只是刪除「有」這一個無關緊要的字，但實質上其意涵的變化卻是根本性的。前者是鄧小平指明中國的發展方向，後者則確立「中國式社會主義」，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發展階段步入成熟階段。從「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標誌著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已進入真正「後殖民意識」覺醒的時代。一方面中共已體認到中國在追求自己主體性的同時，不能自外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全球化，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崛起使得中共更有自信地處理跨越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下的爭議的能力，處理民族國家的差異性、獨立性和全球一體化之間張力的能力。其實，中共早在一九八〇年代鄧小平時期，就已加快腳步的往民族主義的方向邁進，而一九九〇、二〇〇〇年代後的主客觀條件，也只能把中共更加的推向民族主義，終於變成一種成熟的以民族主義為主體、以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為客體的所謂遲後發展的意識型態 (ideologies of Delayed Development)，這個意識型態的特徵在鄧後時期，更加明顯。

三、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一九九〇年五月，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愛國主義與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中，對於愛國主義曾發表過一篇詳盡的談話，他的主張基本上承襲並擴大了鄧小平的愛國主義內涵，他說：

我們所講的愛國主義，作為一種體現人民群眾對自己祖國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進歷史發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同維護國家獨立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愛國主義要表現為致力於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反動統治的鬥爭，把黑暗的舊中國改造成光明的新中國。在現階段，愛國主義主要表現為獻身於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獻身於

²⁵ 在中共一九八二年憲法中，國家的根本任務和發展道路是分開表述的。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國家的發展道路被表述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九九三年修憲，國家根本任務被表述為「根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國家發展道路的表述仍然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九九九年修憲，國家的根本任務和發展道路被整合起來表述為「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二〇〇四年修憲，這一表述又發生了一個微小但十分重要的變化，即將「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修改為「沿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可見，中共現行憲法通過幾次修改，逐漸明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發展道路。以上請參閱趙凌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入憲的過程及其意義，湖南城市學院學報，第26卷（2004年），第10期，頁26。

促進祖國統一的事業。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這是對我國現階段愛國主義特徵的精闢概括。（人民日報，1990：5，4）

另外，江澤民還反覆地強調：「加強愛國主義教育，要貫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體過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0：127）基於此，他特別為愛國主義加上兩個意義：第一，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統一的。他的解釋是：「在今天，我們講愛國就是要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把個人的理想和事業融匯於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0：166）是以，中共認為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體現著共同的根本利益：愛國主義為社會主義提供廣泛而牢固的政治基礎，社會主義又賦予愛國主義以崇高的理想和嶄新的時代內容，使愛國主義得到充分的體現（張秋實，2002：8）。不過在這個意義中，江澤民也附上一個條件，那就是：「為了促進國家統一大業，我們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方針。我們並不要求所有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都贊同大陸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他們贊同『一國兩制』，我們就要同他們加強團結。」（人民日報，1990：5，4）由此可見，用「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乃是中共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時代特徵。

第二，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民主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江澤民指出：「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與人民民主即社會主義民主，本質上也是統一的。」（人民日報，1990：5，4）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江澤民這一論述：一是愛國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現階段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內容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但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全面建設，不僅要搞經濟建設，而且要搞思想文化建設和民主與法制建設，只有搞好包括民主與法制在內的全面建設，才能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得到穩步協調的發展。另一是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愛國主義的重要體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講清楚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西方議會民主的區別。鄧小平認為：「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鄧小平，1993：176）也就是說，中共所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而江澤民所說的人民民主，是「在共產黨領導下，

人民當家作主，建設和管理自己的國家，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內容。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愛國主義的重要體現」(人民日報，1990：5，4)。

至於在一九九四年中共中央印發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第九條強調「要進行黨的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的教育。黨的基本路線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就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最現實、最生動的教材」；第十一條指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教育。我國的憲法和法律是廣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要通過廣泛深入的民主和法制教育，幫助人們了解我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其他各項制度」；同時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努力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人民日報，1994：9，6)。此外，當前愛國主義教育的工作重點：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學習貫徹胡錦濤講話精神，切實加強社會主義榮譽觀教育，堅持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報，2006：1)。

從《綱要》和中共領導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出，現階段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除了承襲鄧小平的觀點以外，其重要特徵主要有三點：其一，「愛國主義」的位階已有超越「社會主義」的趨勢。雖然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上是統一的，但實際上，國家統一高於社會主義制度；其背後的意義是，愛國主義不但包含社會主義而且也高於社會主義。其二，用愛國主義涵蓋民主，中共雖說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卻強調共產黨一元化領導的重要性。其三，即使中共現行憲法中提及公民權利，仍然優先考慮國家和集體的利益。中共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自中共建國迄今，並未落實執行。這樣，中共只有具備了「社會主義憲法」，卻沒有實現世界先進民主國家的憲政主義精神；也就是說，中共要實施的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而不是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民主政治。不過引人注意的是，一九九九年三月，中共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第十二至十七條，其中第十三條即將憲法第五條增加一款，作為該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人民日報，1999：3，22)這是中共政權的另一次重要的轉變。在過去，中共常用「法制」

(rule by law) 一詞，而少用「法治」(rule of law) 一詞²⁶，現今則將「法治」一詞，明白寫入憲法，並說要「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

參 反思與評析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是中國大陸全面加入全球化進程的基本戰略。在政治上，中共加強了與西方各國的接觸，融洽了曾因冷戰而凍結的關係。在經濟上，一是以經濟特區為先導，接著依次開放沿海城市、沿江城市以及內地，形成層層開放的格局，以優惠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從而加入國際分工體系；二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極與國際慣例接軌，為加入經濟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可以說，改革開放既使中國深入全面地加入到全球化進程中，同時也使其從全球背景中獲得了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知識以及變革的思想（胡元梓、薛曉源主編，1998：17-18）。不過，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擴張，中共也面臨了一個新時代下的國家認同問題。這就是說，經過反思和批判文革，以及冷戰的結束，中共已不但不能用過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對抗途徑，而且也不能再依靠魅力型領袖權威來解決大眾和青年學生的認同問題，只能夠「回歸以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相結合的國家民族主義作為憑藉」；這種國家民族主義要求大眾和青年學生「透過效忠國家，跨越種族或族群的界限，融合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李英明，2001：3）。中共對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標榜，除了具有解決共產主義的認同危機的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面對全球化種種挑戰的意涵，此分為五部份論述如下：

第一，中共很難再用一元化方式來應對全球化時代下的國家認同問題。由於中共認為全球化是西化的另一種形勢的表現，於是採取「凸顯中國不同於西方」，以及訴諸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來對應全球化的壓力。然而，在傳統民族主義中，國家是無可爭辯的最高權威，實現國家的政治統一和國家認同歸屬是相對比較容易的，但

²⁶ 鄭永年認為，「法治」的概念不僅僅指法律的存在及其應用，西方自由主義將其作為限制掌權者專斷行為的手段；換句話說，「法治」的概念和限制統治者的權力有關。然而，「法制」不是「法治」，儘管前者是後者的基礎。「法制」是制度和組織上的，它可以被用作不同的目的。國家和政府可以用其法律制度以不同的方法管理其社會。而「法治」的精髓在於所有社會成員都受制於法，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法治」意味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制」不會必然導致這一結果。如果法律不能控制和限制統治者的行為，國家就不能成為法治國家。鄭永年進一步指出，從「法治」的角度看，中國大陸面臨巨大的且不能在短期內克服的困難。其中包括文化、組織和結構上的障礙。這些障礙可參閱鄭永年，政治漸進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台北：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出版，民89年），頁129-159。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不僅是國家，還有個人、非政府組織和各種國際組織都在全球治理結構中占有位置，在各種國際國內事務中發揮作用，由此國家對內對外的權威、合法性及塑造力量減弱，個人、團體對傳統國家和民族身分的認同愈來愈淡薄，開始重新確立自我認同的歸屬，並往往將認同歸屬的對象指向種族、地方、家庭或個人的心中信仰等，這種情形被學者認為具有向後現代轉折的趨勢。因此，中共要想透過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支撐列寧主義政治模式，要求社會和人民、青年學生「支持中共的黨國機器並與之保持一致」；這與大陸人民和青年學生「在解決認同問題時所表現的後現代性，基本上是有衝突的」（李英明，2001：16）。事實上，在對外開放政策下，大陸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已接觸到大量外來的資訊，這其中主要是西方社會所強調的「民主」、「自由」、「人權」、「政黨政治」等觀念，受到青年學生普遍的認同。這些我們可以從學生在民主運動中所提出的口號，得到證實。例如，在八六民運期間，安徽合肥科技大學學生在遊行沿途就高呼「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另外，在八九民運時北大學生提出要求「新聞自由」、「開放報禁」，要求公開否定「反自由化」。從這些青年學生的要求可知，他們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即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國，也只有「民主」的前提下，才有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朱新民，民 79：10）。青年學生的這種共識，主要來自共黨統治下的自覺反省，認識到沒有民主與自由，中國不可能富強。在此認識下，中共越是強調「四個堅持」，就越引起青年學生的反感，也更增強他們對民主與自由的認同支持。可以說，民主和自由才是國家認同和民族尊嚴的最可靠的保證。

第二，中共傳統國家主權面臨全球化的衝擊。毋庸置疑，經濟全球化將打破民族國家的界限，使我們不得不對中共傳統國家主權概念的絕對性、排他性及經濟自主與獨立等一些命題，進行若干的檢視與反思。在中國，人們流行說，自西元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不斷遭受帝國主義的入侵，所以感到極需一個強大的主權，以保護人民免受侵略之苦（石之瑜，民 89：7）。因此，中共建政之後，最重視的是國家能夠維持獨立、自主，及在國際舞台上站起來。維護主權的完整性及獨立性，實際上成為中國大陸日後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則。這也是中共政權與國際社會進行互動時，總是強調自身的獨立自主與互不干涉內政的立場。然而，在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下，主權觀念的分割、受制、侵蝕乃至吞噬，成為不爭的事實，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使中共傳

統國家主權的概念，受到愈來愈多的衝擊，如中共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就必然會受到這個多邊組織的國際規則的制約，亦即當中共加入經濟全球化謀取利益時，它已不能選擇性遵守某些對自己有利的國際準則，而把自己不喜歡的國際準則一概斥之為「干涉內政」，或以不合本國「國情」為由加以拒絕（程曉農，1997：57）。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中共更加積極進入 WTO，且透過世界性及區域性的國際組織，與東南亞、東北亞國家進行區域整合或經濟合作，其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這些具有互賴關係的全球化、區域性經濟的國際組織，可帶給我們下列幾個方面的啟示：（一）對國家主權概念的理解，應該是愈來愈多地體現在經濟方面，而不只是政治與外交方面。「經濟安全」概念的提出，即在告訴我們，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主權概念中的經濟因素，將日益擴增。（二）西方學者提出「三維新外交觀」，即國家與國家間、國家與公司間、公司與公司間的外交做為取代傳統的國家之間的外交；但也有學者認為，這種理解是不夠的，應增加「第四維外交」的概念——國家、公司與國際組織間的外交，從歐盟和其他一些重要國際組織來看，此一外交觀已成為事實（傅小隨，1998：169-170）。（三）傳統民族國家的概念，如今亦應重新修正。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主權儘管依然存在，但它不再具有傳統的那種絕對性，它變得可以讓渡和可以分割²⁷。例如，歐盟在走向聯邦的過程中，其成員國國家主權更是大量地轉移，這對於成員國相互之間而言，彼此都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完整國家了。此外，在參與國際體系的同時，也必須對全球化潮流中的「民主」與「人權」概念有所回應，所以，中共不得不於九七年和九八年，先後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兩份國際人權的公約（黃寬裕，民 89：93）。這些對中共的傳統國家主權觀必然形成新的考驗。

第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成為現階段中共政權意識型態的合法性基礎。

「六四」天安門事件給中共最大的啟發是：中共必須尋求一個在合法性機制上站得住腳的基礎，作為物質利益機制失靈時的危機處理機制。從伊斯頓（David Easton）對於

²⁷ 許多學者都承認全球化有侵蝕、削弱、制約國家主權的作用，如學者汪永成便很具體地指出，經濟全球化是通過「向上轉移」和「向下轉移」削弱了國家政府的權力。所謂向上轉移是指向超國家一級的國際組織（如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有形或無形的權力轉移；而向下轉移是指向國家的中央政府以外的團體單位（如地方政府、企業、人民團體等）的權力轉移。再者，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內的資本、國外的資本、與國家之間利益交錯的複雜三角關係，也使得民族國家的自主性受到影響。以上請參閱汪永成，「試論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行政管理的影響」，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226-229。

合法性的論述來看，中共所要尋求的不外是「意識型態」、「結構規範」與「個人信仰」三種選項之一（Easton，王浦劬等譯，1992：341）。我們先從個人信仰來看，中共目前幾乎不可能再出現一個類同於毛澤東的政治強人，也不容易出現相似於鄧小平的改革領袖，因此，中共無法透過個人的卡理斯瑪來維繫其政權合法性。再者，在檢視結構規範的支持，中共現行的政治制度中，雖然開放了村民委員會的自治選舉，以滿足初始化的中國大陸市民社會，而有逐漸走向民主的客觀可能，但中共政權根本上並無主導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主觀意願，因為民主化和平演變帶來的結果，可能是中共當權者的下台，而這絕對是違背了其政治利益；因此，中共主政者在政制結構上所能做的努力，事實上只侷限於對現行政制和規範的大力宣揚，以爭取更多人民的認同和支持。也因此，中共只能從意識型態去尋求政治社會化的合法性基礎。而在意識型態的層次上，由於同時受制於兩相衝突的共產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中共政權處於一種「社會主義不斷受到質疑、放棄社會主義又如同在意識型態與政治上自殺」的兩難情境下，其所能選擇運用，同時適應於二者的意識型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中共官方深知：在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真正吸引人心不再是「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而「中國特色」轉化在具體實踐的思想政治宣傳上，成為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其理論基礎正是國家民族主義。

其實，中共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若從後殖民角度來看，它有兩個意涵：（一）它在後毛澤東時期是中共形塑「自我東方化」、「自我中國化」時的不二法門，藉由強力區隔中國和西方的分野，更加確立了中國大陸內部的凝聚力量，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取得相當地經濟成績，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其和全球資本主義建立起結構性的有機關係。具體表現在其一方面藉由反和平演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防止中國受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制約；一方面讓中國在重新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過程中，能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表示與西方國家的壁壘分明。如此一來，不但使中共意識型態在統治的合法性上得以繼續維持，同時也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朝向後社會主義²⁸邁進。然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理

²⁸ 羅曉南根據德里克（Arif Dirlik）的觀點，認為後社會主義有三個特徵：（一）它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外的另一條道路。說它「非資」，因為它還是社會主義；說它「非社」，是說它不是一種「純粹」的社會主義，亦即它不是那種理想的、不現實的、具烏托邦色彩的社會主義，而是一種能因應現實的、「實踐」的社會主義。（二）它意味著社會主義本身並非圓融自足的。為了解決「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所面臨的困境，必須轉向社會主義以外的東西，如資本主義、民族主義等來維持或拯救社會主義。（三）

論，原是替後毛澤東時期找出路，但中共卻很認真地「把它說成是人類未來的前途所繫，再度顯現出某種特殊的東方主義化的色彩」（李英明，1999：153）。（二）鄧小平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後殖民意識開始抬頭的年代；到了鄧後時期，由於中國的國力日益增強且足以與西方相抗衡而引起西方的戒慎注意時，中共和大陸民間社會都一致的將西方這種心態視為是一種霸權心態的展現，是一種西方中心的思維模式。這時中國主體意識的覺醒更加昂揚了，而中共的意識型態也持續往一個既「受殖」、又「解殖」的訴求上發展。對後者而言，我們又可以分成兩部份探討：在經濟面上，中共確實已擺脫了「受殖」而進入了「解殖」，並走出一條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生共謀的關係，但在非經濟面上，特別是文化、政治方面，卻未真正的擺脫「受殖」的意識（李英明，2003：159）。然而，中共繼續這種「受殖」的邏輯思維，乃為了因應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走國家民族主義道路做出合理化的辯護基礎；亦即，除了強調西方對中國過去那段的殖民記憶之外，更以殖民主義作為愛國主義的對立面，且特別區分中國和西方的差異性，來合理化其愛國主義教育的論述基礎。

第四，中共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的難局。當我們把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放在「啟蒙與救亡」²⁹的二元架構下，就會發現近代中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所遭遇的難局，很適合用民族救亡同思想文化的啟蒙之間的衝突和不協調發展來理解，這樣對中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意涵也就更清楚了。在這個架構下，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極端的二元對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自中共建政之後，在中國大陸，愛國主義的號召不管多麼空洞，但始終是最有力的聲音，它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自由主義就是它的天敵，並且像流寇般經常被打的落花流水。「抽象的自由」、「資產階級虛偽的自由」、「精神污染」等說法，都是要表明，所有對民族國家最壞、最危險的東西都是自由主義這一敵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水火不容的衝突，或更準確地說，中國民族主義對自由主義無情的排拒和抑制，就習以為常的被延續著（王中江，1997：9、11）。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不能同時並存或互動，主要原因是在於中共對愛國主義教育的誤解。易言之，中共民族主義走的是一條以「黨國」為中心

它意指社會主義的普遍性只限於作為一個「合法的原則」或「模糊的目標力量」。除此之外，社會主義的普遍性也必須讓位於其特殊性；換言之，要尊重現實提出的要求，要兼顧實踐者的國情和歷史處境。以上請參見羅曉南，當代中國文化轉型與認同（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31-32。

²⁹ 這個架構最早是由施瓦滋（Villa Schwarz）和李澤厚所凸顯出來的，引自王中江，「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中國研究，第3卷，第2期（總第26期），1997年5月號。

的道路；在這種民族主義的形構中，「國權」絕對凌駕於「民權」之上，「民族」與自由主義式的「民主」兩相判離，略無交會。雖然，政黨政治是現代民主國家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層面，但是，政黨不等於國家，更不高於國家³⁰。遺憾的是，現今的中共民族主義中，卻有這樣一種現象，即把愛國和愛黨混同在一起，並常常使愛黨高於愛國（王中江，1997：14）。劉平鄰就明白地指出：「第一個中共特殊文化是以黨取代國家和政府。後者替前者來服務。中共黨人經長期武裝革命，權力得來不易。一旦掌政，中共上下都有極為強烈和濃厚的把中國當作他們私產的心理。」（劉平鄰，1994：205）如此看來，中共雖也主張「人民民主」，卻仍將政治方面的現代化摒棄於「四個現代化」之外，而又極端的站在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下，不過我們要知道，沒有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現代化是無法成功的。今日，中共用「愛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這種方式來解釋愛國主義，不但是對愛國主義教育的扭曲，同時也使得國家民族主義往不完全的、偏離民主政治的方向發展。

第五，由於無法對國家民族主義進行合理的重建，使得中共迄今仍未形成一套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中共的民族主義是由毛澤東時期具有排外情緒支配的貌似強大空洞、內在建設卻不足的階級民族主義，轉向鄧小平時期強調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國家民族主義。然而，這種只強調經濟理性的國家民族主義和民主公民社會的憲政愛國主義是不同的。其主要區別在於，前者缺乏後者所具有的民主價值內容，前者的民族國家認同需要極度地以疆域界定（即「我」與「非我」）來彌補其內容限定的不足（徐貴，2001：42）。因此，鄧後時期，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有必要由國家民族主義再度轉型至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這種轉型必須通過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以民主的方式來保障中國大陸的個人公民權利，使其認同國家的民主憲政制度及其價值體系和目標。那麼，中共應如何對目前國家民族主義進行合理的重建呢？（一）要兼顧集體價值與個人自由的平衡發展。現在中國大陸確實有一個進一步改革開放、進一步加強國力、實現富國強兵的現代化之夢的問題，但這都不應該以放棄自由民主為代價。今天

³⁰ 中共只有政黨制度並沒有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照中共的講法，中國大陸的政黨制度叫做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雖然中共強調這是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政黨制度，不同於一黨制或多黨制，但由於中國共產黨是永遠的統治黨，而不是一般輪流執政意義的執政黨，其他黨派則是參政黨而非在野黨，在法律上不具有取代共產黨執政的可能性，因此，若按中國大陸的建政來看，根本沒有西方意義的政黨政治。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其主要功能是反映與匯集民意、提名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甄拔政治人才以及特別是組織政府或監督政府。請參閱鄒文海，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民85年），頁223-238。

的中共政權畢竟已經掌握了國家主權，不再是救亡壓倒啟蒙的時代了。近代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強調集體、壓抑個人，崇尚單一、排拒多元的民族主義往往是既犧牲了個人自由，又葬送了民族利益。退而言之，一個沒有個人自由、人的尊嚴被踐踏的文革式的社會，即使有了主權獨立和國家強盛，恐怕也不是中國現代化所追求的社會境界。(二) 要重視後民族思維之憲政愛國主義教育。中共要建立穩定的政治制度，必須在中國大陸施行「憲政」，建立憲法最高的法律地位，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實施民主憲政的基本模式。像美國、英國及大多數的西歐國家，其執政黨對於憲政秩序和適當的政治程序的本質，都有基本共同的想法；各政黨所宣佈的不同的政黨綱領，只是政策方面而非政權規範上的不同（Walter A. Rosenbaun 著，陳鴻瑜譯，民 73：21）。反觀中共先後的四部憲法皆缺少「憲政」的條件，目前施行「憲政」最大的問題是黨的地位。由於中共認為，作為代表社會的黨可以領導國家，所以造成黨的地位高於國家，國家的憲法就不是國家的最高法律。五十多年來中共領導人視「國權」高於「民權」，視國家憲法為廢紙，其因在此。除非中國共產黨可以自己約束其政治權力，實際地承諾國家憲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否則憲法形同廢紙，談不上「憲政」。是以，如何推動這種具有後民族思維的憲政愛國主義之公民理念，是當前中國大陸實施愛國主義教育應努力的方向。

第三節 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憑藉的愛國主義教育

不管中共政權如何迴避歷史，也無法否認一九八〇、九〇年代之交中國大陸社會的意識型態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是什麼力量使這種危機得到緩解了呢？並且一步步有序地構造中心化的中國大陸教育價值體系？當然，重新確立了九〇年代意識型態教育的思想軸心，是非常關鍵的；就這一點而言，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憑藉的愛國主義教育暫時成為尋求中國大陸社會內聚力的軸心，是非常成功的。它恰當地給「穩定壓倒一切」的歷史情勢提供了必要的精神紐帶，由此構成了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意識型態教育的基本背景。這個背景與知識分子最初的立場並無直接關聯，但也沒有構成直接的矛盾。在大多數情形下，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意義指向是非常明確且直接的，但它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含義卻自然地 and 傳統本位的文化資源相關聯。九〇年

代初期，回到傳統本位是知識分子還處在中共官方允許下個人化的、無意識的學理選擇，不過到了九〇年代中後期，它已經變成了包括中共在內的所有中國人自覺的、積極而主動的振興中華文化的民族主義運動，當然，這種集體性的行為絕對不能構成對中共政權的挑戰。本節分為三部份，首先介紹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其次論述中共如何將文化民族主義作為其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基礎，最後並就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作後殖民的批判和反思。

壹 文化民族主義

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學者張灝指出，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不是屬於某一個特定的政治運動，或者特定的思想學派，而是到處瀰漫的思想氣氛。這種思想氣氛，在散布的過程中，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政治民族主義³¹ (political nationalism)，另一種是文化民族主義 (cultural nationalism)。對於文化民族主義，張灝又進一步指出，它的前提是：每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性格，以表現其民族性或民族精神，才能在民族國家的競爭中，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和地位，才能維持其文化尊嚴。在這個前提上，有些人認為（如康有為和當代的新儒家），獨特的中國民族精神是存在於傳統的儒家思想裡面；也有些人認為（如章炳麟與國粹學派），中國的民族性是存在於中國的歷史傳統與語言文字裡面。因此，文化民族主義不同於政治民族主義之處，是它的保守性常常較高（張灝，民 91：238）。哈契遜（John Hutchinson）則認為，文化民族主義把文化的獨特性視為民族的本質，民族是獨特的歷史、文化與地理的產物，而國家只是偶然的產物，民族不只是一個政治單位而已，它是有機的存在物、活生生的個性。在拒絕政治民族主義所秉持的普遍公民權的觀念下，文化民族主義要求尊重民族之內的性質劃分，例如性別、職業、宗教與地方等，因為對差異性的渴求正是民族創造性的驅動力。此外，文化民族主義不是傳統主義者，他們站在文化創新的立場上，尊崇民族傳統文化，追求平等的參與世界文明的進步（Hutchinson，1987：34-36）。從哈契遜的定義中，明顯的可以發現，文化民族主義不同於政治民族主義之處，乃在

³¹ 張灝認為，政治民族主義是針對帝國主義的壓力，要求中國變成一個獨立的富強的民族國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這種民族主義在文化思想的立場上，可以不受傳統限制，極富彈性，求變性常常很高。請參閱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洪泉湖、謝政諭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 91 年），頁 238。

後者把建立民族國家視為目的，而把民族主義視為手段，前者則把民族主義不僅視為手段，同時也是目的。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民族主義又是與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相應而來的概念，文化帝國主義產生自「文化支配」與「文化霸權」的討論，儘管在概念上文化帝國主義存在的形式與內容仍有諸多爭議³²，但是與之相對的文化民族主義，卻已在第三世界的中國產生，換言之，中共透過文化民族主義這個名詞得到虛假的合法性，這正是當前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現象。

文化民族主義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國大陸的興起，有著非常特殊的現實需求，即是說，對內可重新整合意識型態，有效地確立政治文化和權威性和合法性；對外可以重新劃定道德標準，把那些複雜委婉的外交謀略變成理直氣壯的國家利益的要求。九〇年代初，「國學熱」的出現就是倡導傳統文化的中國大陸從上到下不謀而合的一個不意外的結果。在學術領域，「國學」體現為對傳統文化的再闡釋，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未來世界的重要作用。海內外的新儒家也在以不同方式否認「韋伯命題」³³，不但認為中國文化可以與現代價值共存，並且對於經濟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東亞奇蹟」證明了這一點。到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新儒家理論造成嚴重打擊。在政治領域，中共政府強調傳統文化的價值，高揚愛國主義，也試圖在傳統文化中尋找政治合法性的資源。後來，「以德治國」³⁴的提出也是這一思路的延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2：337）。總之，在中國大陸，所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東方文化復興論」等，已經成為相當流行和響亮的口號。這種發展勢頭，使原本發源於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類頗帶泛中華文化民族主義色彩的豪言壯語，在中國大陸開始得到相當廣泛的共鳴。這正是「國學熱」賴以產生的重要

³² 後冷戰時期，文化因素在民族國家的競爭中重要性大為提高，因而出現了「文化帝國主義」及與之相對的「文化保護主義」與「文化主權」的概念，但在認真分析文化帝國主義這個概念時，卻發現爭議很大，學界並沒有得到共識。湯里森（John Tomlinson）認為談論文化帝國主義有四種途徑：（一）作為媒介帝國主義的一種論述；（二）作為一種國族的論述；（三）作為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論述；（四）作為現代性批判的論述。然而，沒有一種論述是沒有問題的，主要的原因在於「文化支配」與「文化自主」由於缺乏相對應的政治、經濟實體，成為難以識別的語句。請參閱 John Tomlinson 著，馮建三譯，文化帝國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頁39-61。

³³ 韋伯告訴我們，西方透過新教倫理發展所呈現的特性，促動了或支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以新教倫理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精神，正是西方文明表現優於其他地區的關鍵所在。

³⁴ 自從2001年初，江澤民提出「德治」的概念以後，中共的宣傳機器一直在傳播關於「德治」的思想。在中共「十五大」上，「法治」的概念被中共最高領導層所採用，作為中國政治發展的長遠目標。本來想用「法治」來調節中共黨政官員的行為，控制越來越嚴重的腐敗情形，但顯然這種設想並沒有奏效。於是，江澤民回到傳統，想從中國幾千年的「德治」政治實踐中尋找統治武器。「德治」傳統強調統治者在有資格成為統治者之前必須是個有「德」者，無「德」者沒有統治人民的合法性。以上請參見鄭永年，江澤民的遺產：在守成和改革之間（台北：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年），頁61。

社會文化心理基礎。在這種意義上，可以把「儒家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看做是：近百年來在追求國家富強的過程當中，一再受挫的中國人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進取精神復甦、膨脹的一種反映。

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全盤肯定中國傳統文化，這為激進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提供了有利的語境。一九九六年的熱門讀物《中國可以說不》，明確而狂熱地宣揚極端民族主義，顯然是概括和強化了這種歷史動向。由於百年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總是陷入與西方文化相參照的二元對立模式，如此全面肯定中國文化，當然也就意味著可以全面否定西方文化。根據這種思維邏輯，對那些易走極端、慣用「非此即彼」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看問題的人來說，回歸中國傳統本位與反抗西方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其實只有一步之遙。以反激進為起點試圖在「六四」後回歸傳統本位的學院知識分子，怎麼也想不到由他們提示的文化轉折竟如此迅速就釀就了激進化的思潮。現在，中國「威脅論」正在中國大陸被廣泛地利用，它並沒有使中國人冷靜檢討一下，中國在當前國際格局中應占據位置和扮演的角色，以及從戰略上實際考慮在未來應起到的作用，而是從上到下都把它作為增強民族自信心，反西方帝國主義霸權的佐證。一九九三年，杭廷頓發表〈論文明的衝突〉一文，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中間產生極大反響（Huntington 撰，余國良譯，1993：5-22）。就美國把中國視為未來最主要的對手這一點而言，與其說它令中國人失望，不如說令相當多的中國人興奮，它使很久以來抬不起頭來的中國人，再一次體會到作為一個未來強大帝國子民的榮耀，但這份榮耀又能帶給中國現在的發展得到什麼益處呢？「威脅論」與「中國的特殊性」已經成為現階段中國大陸文化民族主義的兩大精神支柱，更是極端民族主義出台的龐大布景，這對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發展也是很不利。

九〇年代上半期，中國信誓旦旦與西方帝國主義水火不容，走自己的特殊道路。一時間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憑藉的愛國主義教育，成為中共政府與大陸社會主導的意識型態。應該說，九〇年代初，西方對華政策存在很大問題，不排除一度有孤立中國的意圖。這樣的國際形勢，當然很容易造成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因為近代以來中國既被迫走向現代化，又每時每刻幻想擺脫西方的現代化模式。陳曉明指出，這是中國幾

代人無法擺脫的「現代性」³⁵焦慮。「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這裡面其實一直掩蓋著一個不言而喻的動機，即最大可能地擺脫西方現代化的軌道。但是當「現代化」一旦與「西方」剝離時，它又變成「中國的」時，它又走到另一個極端，拒不承認現代化的那些普遍標準。那些普遍標準都被視為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與此相對，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一直在構想中國文化能在二十一世紀引導世界文明，這一超級的文化想像背後的動機，與其說是對西方文化的戰勝，不如說是對整個「現代性」——這個壓迫又誘惑中華民族百多年歷史的夢魘——的超越。「一方面，人們急切渴求富國強民，趕英超美，另一方面又拒絕認同現代化的那些基本準則。這二者構成劇烈衝突，足以使中國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表現出種種過份的、自相矛盾的民族主義認同訴求」（陳曉明，1997：41）。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不斷替換和搖擺，是當今中國大陸文化民族主義的特別敘事方式，當中國人強調民族文化的本位性、強調中國道路的特殊性時，它又如何寄望中國的文化價值能成為普遍性的價值，並引導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明呢？

至於中共所建構的文化民族主義，有兩種重要特徵：一是以宗族封建文化為中心的「新華夏中心主義」，二是具有中國農村傳統的「農民民族主義」。這二者的結合使中國傳統中的「宗法基因」，例如「家天下」、「天子思想」、「皇帝神化」等封建文化的思想，貫穿於中共領導階層的思想中，成為中共文化民族主義的組成部份（董立文，民86：150）。到了九〇年代之後，中共的文化民族主義，主要是以強調「亞洲價值」的東方民族主義形式呈現，以弘揚東方或亞洲文化的代表自居，而以「振興中華」作為主要的口號。一九九六年九月，李鵬總理在中共「政協」所舉辦的「展望二十一世紀論壇」上，發表一篇題為「中國的發展和亞洲的崛起對世界未來的影響」的講話，他在肯定「中國是亞洲的一員，中國同亞洲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後，認為「亞洲的崛起」是亞洲國家反對殖民主義、軍國主義與霸權主義，獲得民族獨立地位後，實現經濟繁榮和實力壯大的結果。講話中特別強調「充分重視亞洲優秀文化傳統」、「東亞

³⁵ 陳曉明認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處在現代性的焦慮之中，它以兩個極端的形式來表達：一是急切地進入「現代化」，「西化派」試圖倡明西方的「科學」、「民主」，給中國文明注入變革的活力，以便更快地進入現代化；另一是強調中國文明的特殊性，以抵禦資本主義全球化對中國文明的滲透。文化保守派的思想，並不在「現代性」框架之外，兩者其實密切相關。相當多的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試圖探索特別的「現代化」道路，但這些特殊的道路，是不可能在「現代化」過程之外的。因而，這種文化的「特殊性」，正是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種反應，它構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部份。以上請參考陳曉明，『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二十一世紀，1997年2月號（總第39期），頁40。

文明正在給人類以新的啟迪」，但李鵬並沒有說明「亞洲優秀文化傳統」和「東亞文明」的內容是什麼？只是明顯的向世人宣示，在文化上中共代表中國，中國代表東亞，東亞代表亞洲，並且強調「實踐證明，亞洲豐富的道德文化傳統是促進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積極因素」（李鵬，1996：9，5），將亞洲文明提高到普世價值的地位。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中共這種屬於東亞文明的「亞洲價值」，乃與儒家文化密切相關的。專門研究中共政治的學者白魯洵曾使用「儒家列寧主義」(Confucian Leninism)一詞，來形容中共的政治文化 (Pye, 1988)。但是，中共之所以在文化民族主義中採用儒家學說，張樹強 (Zhang Shuqiang) 認為，應該注意兩個區別：一是「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中國化」(Sinific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另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者是指儒家的世界觀已對中國共產主義造成微妙的、有力的影響，後者只是一種被中共用來合理化一切與正統馬克思主義不符合的事情的方便口號。中共目前的儒家取向，顯然是在放棄共產主義之後所進行的意識型態重建的一部份 (Zhang Shuqiang, 1994: 94)。此外，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儘管中共的文化民族主義採取儒家學說，但是在中共正式的文件中，卻仍找不到中共對儒家思想或是對儒家的代表人物，例如孔子、孟子等人，給予了官方的肯定，甚至在一九九四年中共所發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與一九九六年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所發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無一字提到了儒家文化，很明顯，中共對以儒家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還存有戒心，畢竟儒家文化與馬列主義以及中共革命的意義有太多不能調和的矛盾。

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先驅者反傳統的精神，這種精神與後來數十年人民革命鬥爭的目標是基本一致的。現在，反傳統文化的精神為讚美傳統文化和歷史遺產的保守的民族主義精神所取代，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中共官方的歷史哲學的演變就是這種現象的反映。舊的毛澤東思想所強調的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和農民起義基本上被丟棄，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頂禮膜拜，在中共第三、四代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擔任總書記後的這些年中，這種保守的文化民族主義現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綜言之，中共的文化民族主義，乃是一種黨國操控下的文化主張，其之所以選擇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原因，有其內政與外交上的考慮：首先就內政上來說，作為中共用來取代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愛國主義，在其內容實質上仍非常

空泛，因而大量引用中國歷史上的愛國、愛民典範，如此便會受到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但中共將其限制在有利政權穩定與鞏固的價值上；其次，在外交上中共引用「亞洲價值」，其目的乃在彰顯東、西方文化的不同，換言之，中共之所以在現階段特別重視文化民族主義，也是想利用文化價值上的特殊性，來對抗人類價值裡的普遍性問題³⁶。因為「西方敵對勢力要『西化』、『分化』我們，要把他們那套『民主』、『自由』強加給我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2：704），所以，「亞洲價值」或是東亞文明，都是用來抵抗西方的「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這就是說，中共並不真正的信仰以儒家為中心的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它只是藉由所謂「東方」或是「亞洲」這些字眼，來反抗「西方」，主要目的在於反對民主、自由與人權思想。

最後，中共所建構的文化民族主義，仍然未完全符合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自然也就無法合理建構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就此而言，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乃是一種由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相互結合而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中共目前已接受了孫中山的從帝國主義處借用外資、技術的觀點，如果也想進一步實現這種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則應注意兩件事：（一）回歸傳統文化不是回歸「華夏中心主義」式的文化主義，也不是回歸「新華夏中心主義」式的階級民族主義。中國傳統文化自稱華夏文化，和毛澤東的革命民族主義，都自視為世界的中心，在近現代中國受到種種的挫折與屈辱以後，便產生了盲目仇外與自我狂大兼而有之的華夏情結。這種情結很容易在文化民族主義裡寄生，使得文化民族主義也潛藏一種義和團式的極端主義的趨向，如此就會把中國帶上反現代化偏激自殘的道路。（二）反西方是反西方霸權，而不是反西方文明。霸權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狹隘的「國家利益」的體現，而西方文明並非以此作為必要的前提。文明的價值是可以脫離狹隘的「國家利益」而獨立存在的。在西方現代文明的多元結構中，既有支持霸權主義的資源，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論。反對霸權主義自然必要，但沒有必要連西方的現代文明也一併拒絕，從而喪失民族主義自身的開放性格。總之，現代意義的中國民族主義，應以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

³⁶ 東方的崛起，世界的現代化格局增加了一個新的參照系，現在亞洲的一些領導人越來越多地強調「亞洲價值觀」，譬如新加坡的李光耀、馬來西亞的馬哈迪，中國大陸也提出了「中國特色」等等。這些說法的出現說明了什麼現象呢？第一，說明現在人們對現代社會的文化模式到底應不應該完全像西方，已經產生了疑問；第二，說明亞洲各國的人對保持自己的文化模式，並使之加入到現代化社會之中，已經產生了自覺。以上請參閱侯軍，「世紀展望：多元文化中的中華文化（金耀基教授訪談錄）」，明報月刊（香港），1998年1月號（總385期），頁25-26。

中庸精神，來調和或消解存在於中國大陸的兩種西方文化，即現代的西方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立，並通過挖掘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如推崇倫理親情、重視人際關係和諧及道德理性的原則等，進而與學習西方優秀文化形成互依互動的關係，這樣才能發揮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明做出貢獻。

貳 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

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任務與內容主要有三：首先，在適應改革開放形勢的新要求下，應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並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德育貫穿整個教育過程。為此，中共當局把愛國主義教育視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性工程，以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其次，為了堅持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來抗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抵抗資本主義的侵蝕腐化、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共當局重新肯定儒家思想與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來加強個人的國家責任意識和對集體的奉獻精神（謝均才，1999：189-190）。再次，在中共重建統治權力的過程中，整個八〇年代，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仍建立在意識型態上，雖已不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對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經過改革的社會主義許諾；一九八九年後，這一言說經歷了持續不斷的變形，「中國特色」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而其「社會主義」內涵則每況日下，只剩下名義而已。「三個代表」思想正是在這種「中國主體」的思維下被建構出來的。在鄧後時期，不管是社會思潮的發展、意識型態的建構與愛國主義教育的操作上，都呈現出一種「中國主體」或文化民族主義的意涵。這與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主體」是不同的，中共的意識型態在鄧小平時期開始由「社會主義主體核心」向「中國主體核心」過渡，而這種情形在鄧後時期更是明顯。這裡，我們針對上述的任務與內容敘述如下：

一、愛國主義教育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一九九四年八月，中共發表《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這份《綱要》指出，加強愛國主義可以振奮民族精神，團結人民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因此愛國主義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體素質和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性工程，可以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理想、信念、人生觀、價值觀的共同基礎，為全社會的

重要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6:513)。此外,中共為了幫助其宣傳工作者,各級黨政機關領導幹部和工作人員,以及群眾學習這份《綱要》,還出版了《愛國主義教育學習文選》一書,匯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人有關愛國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論述、講話及文章,讓讀者參考(人民日報,1994:9,6)。中共現階段所提倡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原則,不僅是要處理好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關係,同時也要把愛國主義教育提升到新的高度,使愛國主義成為推動精神文明建設、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障(張平,2002:11),成為中華民族團結的凝聚力和精神的支撐點。

這份《綱要》所強調的愛國主義教育,其重要原則和內容是:第三條,「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堅持重在建設的方針。要按照鄧小平同志關於愛國主義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搞好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建設、教材建設、制度建設和基地建設。把愛國主義教育貫穿於各項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性工程,作為我國社會的主旋律,堅定不移、長期不懈地抓下去»;第六條,「愛國主義教育的素材非常廣泛。從歷史到現實,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從自然風光到物產資源,社會生活的各領域都蘊藏著極為豐富的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瑰寶。要善於運用國情資料,並注意挖掘和利用各種寶貴的教育資源,不斷豐富愛國主義教育內容」(人民日報,1994:9,6)。一九九六年十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閉幕時表示:「愛國主義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要貫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江澤民,1997:2)。不過,回顧整個八〇年代,中共還將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全黨工作的中心;但到了九〇年代,中共在現代化建設的各個層面中卻只接受物質科學文明,而排斥其他的價值,並以文化民族主義的心態將之視為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神污染,因此形成了對西方文化的矛盾心態。

中共對西方文化的矛盾心態,具體的反映在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中共以官方文件所發表的兩份有關「精神文明建設」的文化主張上,亦即一九八六年的「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與一九九六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從中共民族主義轉型的角度來看,這兩份「決議」具體呈現出中共文化重建的內容與方向。更重要的是,兩份「決議」的對照也反映出作為一種遲後發展的意識型態,中共民族主義在對待西方文明上的表裏不一、前

後矛盾。八〇年代，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中共強調要進行「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此即現代化道路是一條結合中西文化的建設道路。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建設只搞物質文明建設不行，還必須要建設高度的精神文明（鄧小平，1993：156）。在鄧小平的指示與引導下，中共在八六年的「決議」將「精神文明建設」涵蓋的內容，包括了思想道德建設與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兩大方面，強調「近代世界和中國的歷史都表明，拒絕接受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要發展進步都是不可能。閉關自守只能停滯落後」；強調對外開放則「必須下大決心用大力氣，把當代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具有普遍性的經濟行政管理經驗和其他的有益文化學到手」；並強調「不這樣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實行現代化。對外開放作為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不僅適用於物質文明建設，而且適用於精神文明建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87：1152-1156）。這份「決議」明確指出中國現代化道路是一條結合中西文化的建設道路，也就是所謂的對外開放「不僅適用於物質文明建設，而且適用於精神文明建設」。

不過，到了九〇年代之後，中共表面上強調要「兩手抓」文明的建設工作，但實際上捨棄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建設，轉而強調以傳統文化為中心的愛國主義教育主張。這就是說，八六年的「決議」的文化建設方向在九六年的「決議」中明顯的被修正。江澤民指出，「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無疑要致力於發展生產力，把物質文化建設好。同時，必須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並強調「始終不渝地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2：380）。然而，九六年的「決議」在談對外開放時突出的強調「對外開放也會有風險，資本主義腐朽東西會乘機而入……如何在擴大對外開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況下，吸收外國優秀文明成果，弘揚祖國傳統文化菁華，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傳播，抵禦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的圖謀，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認真解決的歷史性課題」；而其未來文化重建方向是「弘揚主旋律，廣泛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人民日報，1996：10，14）從這兩份「決議」中所呈現出的文化重建方向的轉折來看，顯然，中共在尋找民族主義的出路上，再次對西方精神文化的懷疑與拒絕，但對西方的科學物質文明卻全盤接受，由此，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民族主義。此外，八六年「決議」尚闡出專章討論「建設民主政治」，九六年的「決議」則無一字提及「政治體制改革」。

也就是說，當前中共所努力的是以愛國主義教育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來解決民族和國家認同的危機；但是，缺乏憲政民主內涵的愛國主義教育能否有效的解決其認同危機，仍屬可疑。

二、愛國主義教育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歷史與傳統文化

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初，鄧小平便指出：「必須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就會被種種資本主義勢力所侵蝕腐化。」（鄧小平，1983：328）這裡，鄧小平明確地表示，要用愛國主義教育來挽救社會主義、並希望達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目的，不過他對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也僅僅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也就是說，他要用中國傳統民族文化來抵禦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與制度的滲透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良影響。而這段話更深層的意義是，十九世紀末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恥辱，深深地烙印在鄧小平的心中，鄧的民族歷史觀就是一幅中國積弱不振而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圖像。所以在鄧那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連繫在一起的，這兩者中間是由愛國主義教育作為中介。意即「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國際主義、愛國主義都屬於精神文明的範疇」（鄧小平，1993：28）。從以上鄧的講話看來，鄧小平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基本上仍是源自於對中華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尊重與民族自信心的建立，對於階級鬥爭和馬列思想則較少提起，但為了維護共產主義政權意識型態的合法性，他依舊必須藉著愛國主義教育來鞏固改革的步伐。到了鄧後時期，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又有了更進一步的內涵，如果說鄧小平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是保守的、內省的，那麼鄧後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則是開放的、外發的。當面臨蘇聯共產制度瓦解、東歐共產國家解體之後所造成的衝擊時，使中共當局必須不得不擴大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在共產黨國家所帶來的危機意識中，重新找到「後共產主義社會」的定位與存在的價值，以及國家生存發展、政權穩固堅實的合法地位。

那麼，鄧後時期中共的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是什麼呢？江澤民對中共如何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歷史與優秀文化傳統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他說：「中華民族是有悠久歷史和優秀文化的偉大民族，我們的文化建設不能割斷歷史。對民族文化

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並結合時代的特點加以發展，推陳出新，使它不斷發揚光大」；並強調「我們民族歷經滄桑，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文化。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很好地繼承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2：385、387）。而在中共中央所印發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的通知中，第七條指出，「要進行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教育。我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要通過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現代史的教育，使人們了解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發展歷程」；第八條則強調「要進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中華民族在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文化，其內容博大精深，不僅包括了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成就」與「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氣節和優良道德」（人民日報，1994：9，6）；另外，也要「大力宣傳愛國先進典型」，這包括「中國歷史上湧現過無數的著名愛國者、民族英雄、革命先烈、傑出人物」等；只要與中華民族的歷史和傳統文化有關者，包括博物館、文物保護、歷史遺跡、壯麗山河等，都屬於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04：10）。總括而言，現階段愛國主義教育的原則，是中共對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肯定，並將之作為充實其意識型態合法性的具體內容。在中共大力推動下，大陸各級學校的校園中，以「知我中華，愛我中華，興我中華」及「我愛神州」為主題的歷史和國情教育普遍展開，使得這種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憑藉的愛國主義教育達到高潮。

至於中共對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又希望能夠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呢？鄧後時期的中共之所以要繼承與發揚中華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其主要目的有二：（一）增強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需要。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對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做出了一些說明，他指出：「它淵源於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它反映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基本特徵，又對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起巨大促進作用。」在這裡，江澤民希望把文化與經濟、文化與政治的關係，把社會主義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有機地連繫在一起。他接著又說：「只有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只有兩個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標誌」（人民日報，1997：9，12）。

由此可知，中共不但讓所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而且也希望藉著中國傳統文化能作為中共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精神動力。(二)抵禦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共實施「西化」、「分化」圖謀的需要。在中共看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西方敵對勢力加強實施「西化」、「分化」圖謀，把戰略重點放在中國這個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上。江澤民指出，「西方一些敵對勢力與我國一些分裂主義勢力加緊勾結，利用民族、宗教問題，不斷挑起事端，就是企圖在我國打開一些缺口，進而實現其『西化』、『分化』中國的政治圖謀」；又強調「要堅持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教育，進行近代史、現代史教育和國情教育，增強民族自尊、自信、自強的精神，鞏固和發展人民內部平等、團結、友愛、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關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2：378、402)。是以，中共乃從抵禦西方對中國大陸實施「西化」、「分化」圖謀的高度，來闡釋其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精神的現實意義。辺

其實，中共在鄧後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踐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過程中，一直都沒有處理好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之間的關係問題。而很明顯的事實是，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運作已不再走古典的或純社會主義道路，而是往後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中共現在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歷經毛澤東時期大躍進和文革，以及鄧小平時期中國大陸的結構現實的衝擊，其意涵恐怕連中共都很難說清楚；另外，中國傳統文化遭致清末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各種立場人士之批評、否定或過度保護，其意涵恐怕也失去了交互主體性的認識(李英明，1999：85-86)。因此，從這兩種向度來看，中共如果想回歸中國傳統文化，甚至將它和現代化結合來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基礎，恐怕並非易事。更進一步言，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強調中央集權政府與黨的角色，其中「加強黨的建設」，被中共用來當作解決現代化所遭遇困難的重要方案。而今日的中共，也只能靠這條愛國主義式的現代化戰略選擇，來保證穩定的政治秩序、促進經濟的發展，以及達到維護政權合法性的目的。總之，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衝突，怎樣融合中西文化，一直是中共建構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面臨的兩大難題。一九九〇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導入，群與己、義與利、自由與紀律、競爭與和諧等衝突更為激烈。而且，全球化時代的世界一體化，將徹底打破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資訊封鎖，促使人們思想意識的多元化。面對這些挑戰，中共的愛

國主義教育只有與世界接軌，進一步擺脫政治化、抽象化、空洞化的教育模式回歸生活，貼近社會，同時讓中國傳統文化不僅能單方面吸取和利用西方科學物質文明，而應更使其與西方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相互辯證的結合，這樣中國大陸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才能獲得正面健康的發展。

三、愛國主義教育要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旗幟

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二〇〇〇年二月視察廣東時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重要思想提出後，經過二〇〇一年「七一講話」、二〇〇二年「五三一講話」的系統闡釋，並在中共黨內發動了一場學習這一重要思想的運動。中共高層把這一理論提高到極高的地位，認為這是江澤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新發展，是鄧後時期裡建黨的新學說。可以說，「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已經成為「江澤民論述」的總稱（林琳文，民 91：25）。同時，也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舉行的中共「十六大」寫入黨章，正式成為中共意識型態的一部份。「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應與當代中國的愛國主義，在價值觀上完全一致。董俊蓉認為，共產黨人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高揚以『三個代表』為標誌的當代中國愛國主義旗幟，就是將『三個代表』中的愛國主義思想充分發掘出來，使之煥發出新的巨大能量，就是將『三個代表』思想充實到愛國主義寶庫中，使它更豐富更富凝聚力」。她又說，我們要「從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認識，正是我們把『三個代表』與愛國主義放在一起思考研究的重要原因，『三個代表』是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標誌、特色」（董俊蓉，2002：20）。所以，當前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必須要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旗幟，從愛國主義的角度認識「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對於中共要完成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要完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把中國大陸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有其重要的意義。

「三個代表」此一思想的旨意是，強調生產力以取代以往的階級鬥爭，強調文化發展以代替意識型態，強調廣大人民以捨棄階級論。其目的在求中共能繼續生存、執政和發展。在理論內容上，發展社會生產力，是「江澤民論述」的核心，並作為二十

一世紀中共「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它一方面深化了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時針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發表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後來以「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社會生產力、有利於綜合國力、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生產力標準解決了「姓社」與「姓資」的爭議。另一方面，它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作為中共政權及其意識型態正當性的基礎（林琳文，民 91：28）。在實踐的層面上，「三個代表」思想不僅是因應中共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新挑戰，同時更是負有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努力。江澤民指出：

貫徹「三個代表」要求，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保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全黨同志要牢牢把握這個根本要求，不斷增強貫徹「三個代表」要求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貫徹好「三個代表」要求，必須使全黨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必須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必須以改革的精神推進黨的建設，不斷為黨的肌體注入新活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2：583-584）

所以，對中共來說，「三個代表」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建設「執政為民」的指導思想，它豐富了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內涵，為愛國主義教育在鄧後時期注入新的生命力；它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只有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相結合，當代中國愛國主義教育才能充分體現它「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才能將熱愛國家和人民轉化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並在中華民族復興中完成它的歷史任務。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中，我們首次看到，「中國主體」地位真正被提升到一個最高的位階。三個代表中提到的「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以中國主體為考量，這其實便是代表著傳統的馬列毛思想意識型態主體已被中國主體所取代了。若以中共意識型態二元結構來看，在毛澤東時期，核心部份是指馬列主義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外圍的實踐部份才是符合中國國情所做出來的實踐方針與具體作法。在這種思維下，「建設一個『馬克思主義下的社會主義』是主體，中國只是一個被實踐的歷史客體」；可是，在「三個代表」的思想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成為主體，而馬克思主義下的社會主義卻變成一個被實踐的客體了」（賴皆興，民 91：109）。換言之，「三

個代表」思想除了標示江澤民已在鄧後時期將其作為維繫中共政權正當性與合法性之外，也由「社會主義主體」轉向「中國主體」了。此外，「三個代表」思想另一個意義是，從鄧小平時期一直在做的一種對社會主義意涵賦予中國化詮釋的歷史命題，在鄧後時期得到了完成。從此以後，「社會主義」不再是西方的產物，不再是為了區隔或面對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下所選擇的一種意識型態，而是經過中國本身具體實踐、符合中國國情和中共革命實踐後重新產生的一種實踐型理論。賴皆興認為，在鄧小平時期的「社會主義中國化」，到了鄧後的江澤民時期成為了「中國社會主義」；而這種社會主義的內涵，「不必再去強調與資本主義的不同，不必再去強調是『有中國特色』的來做出區隔，因為，它就是中國的」（賴皆興，民 91：110）。總言之，「三個代表」思想的這種轉折，一方面使得中共政權的存在正當性不必再藉著堅持社會主義思想來維繫，另一方面，也代表中國大陸逐漸走出一種受制於西方的東方主義氛圍、而開始重新思索建構自己的道路。

然而，「三個代表」思想在走向「中國主體」道路和作為當前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指導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報，2007：2）時，它也必然面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受到挑戰、黨的階級基礎與屬性受到衝擊，以及社會多元化後民主機制的建立等課題（林琳文，民 91：29-30）。在中共意識型態上，「三個代表」重新定義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共由一個階級政黨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打破中共的階級屬性；此後中共「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屬性將大為降低，而成為一個包容所有菁英群體的「全民政黨」或「執政黨」。此種轉變與前蘇聯的「全民黨」大不相同，蘇聯在赫魯雪夫號稱蘇共成為「全民黨」時，已建立起全面的「計畫經濟」體制；而中共藉由「三個代表」成為的「全民政黨」，卻是在「市場經濟」獲得完全勝利的背景下所提出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此一改革顯然將更有利於中共擴大政治菁英的甄拔空間，由此可能降低反對勢力的壓力；但也因此，「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絕非「民主改革」，而可能只是更進一步向過去亞洲四小龍的「威權政體」靠攏的轉變（田麗虹，民 91：104），此即指威權式的有限多元主義的政治圖像將可能會躍上中國大陸的政治舞台。雖然一個共產政權向資本主義威權政體的轉變，仍具有重要意義，但顯然距離民主的目標還非常遙遠。因此，表面上看，「三個代表」的思想反映了中共求進步，用轉型來提升其統治合法性的努力，

但很難看到「三個代表」思想和現代意義民族主義民主政治之間的任何關聯性。要意識到的是，現代國家所產生的民主政黨對社會上各種利益的代表是通過憲政民主制度加以實現的。所以說，如果沒有第四個代表，即中共能夠代表憲政民主制度發展方向，「三個代表」思想會是空洞無物的。如果不用憲政民主原則來建黨，有憲政民主制度機制，「三個代表」思想就不會有落實的可能，更沒有任何制度上的保證。

參 反思與評析

中共所奉行的馬列主義，是在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徹底絕裂的情形下而形成的，它之作為中共的意識型態完全是中共強制的政治力量所使然，在後文革時期中國大陸人民心中的「三信危機」的對照下，它是絕對無法獲得人民的認同的。因此，鄧小平時期和鄧後時期中共意識型態再建構的另一特徵，就是企圖重新利用民族情緒與文化認同來引導社會認知，移轉社會對毛澤東時期共產主義實踐失敗不滿的情緒。中共抨擊那些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是「民族虛無主義、賣國主義」，抨擊他們鼓吹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不僅要否定現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歷史，更是否定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與否定中華民族，並把中國引到西方資本主義附屬國的地位(張雅君，民79：36)；所以，中共要積極宣揚「愛國主義」，表示要藉由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來凝聚中國大陸社會對其已失效的意識型態認同。這裡我們仍要分為五部份，來對中共的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作後殖民批判與反思：

首先，在全球化衝擊下，中共利用文化民族主義使自我東方化，來重建民族國家認同。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共除了採取包括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國家民族主義來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外，後來更充分利用文化民族主義來重建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認同。這種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企圖以「中國主體」認同為基礎的民族國家認同的操作模式，它特別強調近現代中國文化已被西化或「他者化」，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中國人若再不重視對中國主體認同與論述，那麼就會使中國失去自己的主體性；而要解決此種認同危機，必須向傳統文化回歸。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目前還沒有能力做到以中國中心觀的論述來影響西方對中國的看法，所以，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對「中國主體」認同的論述模式，最後只讓中共走向一種「自我東方化」的道路。這條道路是在東方主義的理論架構下，利用對「西方」的論述來強化「中國主體」認同

和凸顯中國有別於西方這個「他者」的特性。以西方作為對照，來界定與釐清中國自己的民族國家身分。西方這個「他者」的概念在鄧小平和鄧後時期成為解決「中國主體」認同危機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當然，中共利用文化民族主義使自我東方化來重建民族國家認同，實際上也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在中國大陸再度出現中國式的文化主義帝國作風。由於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在提倡文化民族主義時，是往一種「自我東方化」的方向發展，把做為中國和西方之所以不同的「我」與「他者」間的界限區隔開來，使得文化民族主義很容易走向「中國式的東方主義」：認為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不僅適用於中國，還包括東南亞、東北亞甚至全亞洲，這是一種「亞洲價值論」的自我中心觀的表現。它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東方主義」訴求，也是一種中國式文化主義帝國表現（李英明，2001：32-33）。因此，中共在提倡文化民族主義的同時，若能與自由主義式的憲政愛國主義相結合，如此才不會使得愛國主義教育走向盲目排外的極端民族主義，而是真正建立符合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認同。

其次，在資訊化、全球化的時代，中共的國家主權在經濟向度上，已從「絕對主權」逐漸地轉變成「互賴主權」。當中共要進入國際經濟循環中，就必須設法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主要核心國家或地區發展關係，甚至逐步接受世界經濟體系的規範，這就使得中共必須調整過去的「絕對主權」而變為向符合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互賴主權」向度傾斜。中共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如前述，基本上是一種後殖民意識覺醒的表現。這就是說，中共這種後殖民意識的覺醒，正表現出對後現代主權原則的認同——互賴主權，即強調全球資本主義意識與後殖民狀況的共生共謀關係的發展。全球資本主義意識是指資本主義不再只是西方先進國家論述的專利，中國進入後殖民論述就是要去參加各種雙邊或多邊組織，就是要讓自己具有主體性去重新參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建構。例如，中共在處理南海的領土領海問題上，已可看到中共採用「互賴主權」的概念，主張把主權問題擱置下來，有關國家可共同開發、分享資源。不過，在文化、政治向度上，中共仍然堅持絕對主權的概念，並沒有擺脫「受殖」的意識，一直延續著殖民主義的邏輯，如此才能在對外開放中為走文化民族主義道路做出合理辯護基礎。然而，中共這種官方的自我東方化，一方面可以用來壓制中國大陸社會的多元化意見，以避免有向國家機器挑戰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後殖民角度去批判西方的民主、人權概念，即指稱西方的民主、人權是以西方的東方論述做為支撐，中國不

處於西方殖民主義的宰制之中，中國有一套符合自己的國情和特色的民主、人權標準（李英明，2001：82）。總的來說，對中共在經濟向度上，能採取符合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互賴主權概念，這種不帶本質化的後殖民論述，相信有助於中國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但在文化、政治向度上，中共仍然堅持絕對主權概念，以文化民族主義為訴求，很容易淪為另一種文化本質主義的對抗。西方和中國的關係並非被本質所規定，它們不能被固定化，是不斷在變動發展中。因此，中共若想建構健康、合理的後殖民論述的愛國主義教育，便應走後民族主義的道路。

再次，我們認為從鄧小平和鄧後時期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來看，中共迄今仍然沒有建立或接受一種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其一，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中共政權除了以反和平演變訴求來面對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價值觀念的挑戰之外，也同時高舉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大旗。在中共這種自我東方化的文化民族主義的背後，是中國傳統華夏中心主義下文化主義的復辟：它主要透過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凸顯中國大陸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獨特性與不可替代性，從而用來抵擋西方文化價值觀念的挑戰和滲透。而且，在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訴求下，「中共就傾向於突出西方力量對中國大陸的滲透和宰制，從而就不願至少在形式上承認國際體系中的民族國家是對等的」，也不承認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是可以在對等的基礎上進行辯證的相互滲透，而是「一種宰制或被宰制的關係」（李英明，1999：83）。其二，現階段中共之所以重新肯定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學說，其意義與其說是意識型態的重建，不如說是意識型態的自我否定。這是因為馬列主義與儒家思想根本上是一套對立的東西。一九九〇年代初，中共著名學者李一氓寫了一封信給上海復旦大學蔡尚思教授，信中說：「我們無法把馬克思主義的地位輕易地讓給孔子，因為我們的世界觀無法接受一個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可是我們現在連這個簡單的藩籬都拆掉了，弄的人們不太清楚如何分辨馬克思主義和儒家學說，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和封建主義。……這些年來，對孔子和孔子學說的評價越來越高，對孔子的推崇和宣揚也越來越甚。」（李一氓，1990：12，26）這些話很準確的反映出中共在鄧後時期，將文化民族主義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指導理論之意識型態重建的困境。

其三，在鄧小平時期，中共有鑑於毛澤東時期以「關門」來重建中國主體的政策錯誤，「所以用『開門』的方式，但在『開門』的時候，面對的是如何消除再次被客體

化的危險」，因此，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一方面藉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使中國崛起來加強民族的自信心與凝聚力；另一方面，又藉由文化民族主義與意識型態的重新建構，雙管齊下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實際上——國力變強、國際重視、當中國人沒什麼不好，並獲得自我主體建構的正當性，人民也慢慢由對中共政權的反抗轉向雖批判但仍支持這個國家」（賴皆興，民 91：22）。鄧後的江澤民、胡錦濤時期，是「解殖」與「再次受殖」的關鍵時刻，中共想建立自我的主體性受到市民社會的意見限制：後者對外展現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對內則是壓迫政府能夠順應時代潮流，亦即對內希望政府去除「受殖」的那一部份，而真正走出中國自己的主體性；「三個代表」思想，便是這種情形下的產物。綜言之，雖然「中國人民希望的是以『真正的中國』為主體，但中共卻走不出『受殖』的恐懼感，所以仍是以『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為主體，而非中國人民希望的中國」（賴皆興，民 91：23）。因此，「三個代表」仍然處在「中國共產黨是主體」的認知架構下，它充其量還是鄧小平時期的實用主義的延續。既然是實用主義，那麼它就很難阻止中國共產黨的繼續衰敗，至少是意識型態方面的衰敗，因為它只不過是為了給中共的各種現實政策提供一種合法性，而非表示中共要提供一種理論去引導現實的發展。中共如果要真正能夠以「中國是主體」來實踐「三個代表」的思想，那就必須做制度上的根本調整，即改變現在中國共產黨壟斷一切政治權力的局面，通過憲政民主的方式把新產生的各種利益整合進現存體制。換句話說，中共如果要擔當其所說的三個方面的代表，就要有根本性的政治制度的變革，如此也才能真正建立合理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

最後，我們必須站在後殖民主義的角度，使全球化和本土化、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能夠兼容並蓄、互容互攝的發展，這樣才能保證文化創新與愛國主義教育發展所必要的基本張力。當我們深入文化層面對全球化進行考察時，就會發現我們已陷入「文化民族多元化」與「文化全球一體化」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文化多元化論意識的增強，促使人們更加偏執於『特殊主義』或『地域主義』的文化價值立場，對人類普遍價值理想和道德規範的信心將大大減弱」，而另一方面，「現代人和現代世界越是強烈地意識到文化多元分庭競爭的現實，其尋求某種形式的跨文化差異的普遍共識的願望便越發強烈」（萬俊人，2001：303-304）。因此，對全球化的反思就應該在一種合理的張力之中進行，即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持守一種辯證互動的文化立場。此外，我們

要指出，在全球化時代，唯一可以維持文化多元化，給少數民族文化以自由競爭的空間，而又不使之過分凸顯個性從而陷入衝突的制度安排，可能就是憲政民主制度。而就今日中共的文化民族主義來說，其片面側重以文化認同為基本構成原則的民族主義，即有可能是抑扼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普遍性價值的重要因素；職是之故，中共對於這種因缺乏反省、批判聲者而帶來過度膨脹的民族主義，確有必要自覺的加以控制。前述所謂的「孫中山式的民族主義」，顯然符合此時需要：它承諾普遍主義的民主價值，且透過訓政、憲政的循序漸進程序來實現；在此同時，它也具有文化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這種特殊性的環節，但又不執著此一環節。所以，孫中山式的民族主義若能適時凸顯，至少對於中共另一種日益特殊主義化的階級民族主義，將可形成某種牽制、平衡的張力效果（羅曉南，1997：225）。總之，孫中山將「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當然包括民生主義）並舉，實是大眼光，他所創導的可以說是一種「公民式民族主義」或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是把「集體自由」與「個體自由」相結合的，其實這正是中國百多年來所追求的現代性，筆者相信，「孫中山式的民族主義」才是建立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最佳的出路。

本 章 小 結

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內涵，主要包括階級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毛澤東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乃是以階級民族主義為主軸，而鄧小平時期與鄧後時期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則是偏重於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

一、以階級民族主義為主軸的愛國主義教育

在階級民族主義方面：（一）窮過渡和唯意志論。毛的窮過渡是以片面誇大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為前提，這與大躍進的思想一致。（二）群眾路線與民粹主義。毛不信任知識分子，他對群眾的自發性依然持民粹主義的信念，相信在群眾自己的革命實踐中會產生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三）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毛提出一個文革式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它比蘇聯式的更激進、更具革命性，且同毛眼中的民族利益相吻合。（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

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 勞

在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方面：(一)堅持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意識型態教育；(二)強調階級鬥爭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三)加強國際反帝、反霸和反「和平演變」的教育。自中共建政以來，各級學校的教育目標，標榜馬列主義毛思想，鼓吹領袖崇拜；崇尚共黨專政意識，對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表示敵意；積極鼓吹愛國主義教育，強調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推展群眾運動和國際主義運動等。

在反思與評析方面：(一)中共必須面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如何中國化的問題；(二)毛的階級民族主義中隱含著華夏中心主義的成素；(三)中共的國家主權觀一直遵守威斯特伐利亞的絕對單一化的主權概念；(四)意識型態教條與發展現代化的衝突問題；(五)毛的階級民族主義具有巨大的反帝、排外思想，它曾經成為中共國際行為最重要的組成部份。這種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主要是在毛澤東時期建立起來的，而到了鄧小平和鄧後時期仍未被清算過。

災

二、以國家民族主義為依托的愛國主義教育

在國家民族主義方面：(一)思想上依然堅持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中共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民主與法制建設也只是放鬆經濟的管制，在公民政治權利仍無任何實質的保障。(二)由於開放政策與市場經濟體制之建立，使得中共的國家民族主義有可能往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內涵的孫中山式的民族主義發展。(三)中共在國家民族主義支配下的民族政策，漢族和少數族群依然是由「先進／落後」、「現代／傳統」的二元對立範疇所構成。(四)後冷戰時期以來，中共更加倚賴國家民族主義來處理對外關係和對台政策。

在國家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方面：(一)用愛國主義教育來挽救共產主義危機。(二)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指導思想，已由共產主義轉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現階段中共愛國主義教育的特徵是：其一，「愛國主義」的位階已有超越「社會主義」的趨勢；其二，用愛國主義涵蓋民主；其三，即使中共現行憲法中提及公民權利，仍然優先考慮國家和集體的利益。

在反思與評析方面：(一)中共很難再用一元化方式來應對全球化時代下的國家認同問題；(二)全球化將打破民族國家的界限，使得中共有必要對傳統國家主權概念的絕對性、排他性進行檢視與反思；(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成為現階段中共政權意識型態的合法性基礎；(四)當把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放在「啟蒙與救亡」的二元架構下，就會發現中共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遭遇的難局；(五)由於無法對國家民族主義進行合理的重建，使得中共迄今仍未形成一套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三、以文化民族主義為憑藉的愛國主義教育

在文化民族主義方面，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回到傳統本位是知識分子還處在中共官方允許下個人無意識的學理選擇；到了九〇年代中後期以來，它已變成了所有中國人自覺的、積極而主動的振興中華文化的民族主義運動。至於中共所建構的文化民族主義，特徵有二：一是以宗族封建文化為中心的「新華夏中心主義」，另一是具有中國農村傳統的「農民民族主義」。九〇年代之後，中共的文化民族主義，主要以強調「亞洲價值」的東方民族主義形式呈現，以弘揚東方或亞洲文化的代表自居，且以「振興中華」為主要口號。

在文化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方面：(一)中共當局把愛國主義教育視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性工程，以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二)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是對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的重新肯定，並將之作為充實其意識型態合法性的具體內容；(三)中共認為，愛國主義教育必須要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旗幟，從愛國主義的角度認識「三個代表」思想，對中共要完成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有其重要的意義。

在反思與評析方面：(一)在全球化衝擊下，中共利用文化民族主義使自我東方化來重建民族國家的認同。(二)在資訊化、全球化時代，中共的國家主權在經濟向度上，已從「絕對主權」逐漸轉變成「互賴主權」。(三)從文化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中共迄今尚未建立或接受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原因是，第一，中共的文化民族主義，其實是中國傳統華夏中心主義下文化主義的復辟。第二，中共重新肯定儒家文化，其代表的意義是意識型態的自我否定。第三，「三個代表」思想，表示中共仍未走出「受殖」的陰影，它依然是以「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為主體，而非中國人民希望的中國。